

# 海上法蘭西

## ——從王韜的法國史志談晚清「海上知識社群」的思想特徵與文化實踐

呂文翠\*

前言：

本文聚焦王韜(1828–1897)所撰法國史志與相關著作，論析晚清時期輻輳於上海的文人與知識社群之思想融匯與文化實踐，揭示「海上知識社群」交會於上海一地，而始終面向世界的特徵。「海上」一詞，特別是在晚清上海文化圈中往往是別稱本地之語彙，但本文所指「海上」，意在試圖呈現更複雜深邃之內涵，非徒具標示區域地名或行政單位劃分的作用。概念宗旨側重於交通，既有舟楫交際，更有意識觀念遙通東亞乃至泰西之涵義。對外，是通往異域、異族文化乃至器物文明之「門戶」；對內，則呈現其地域邊緣之模糊性，既可吸納周邊(特別是江南地區)之官紳仕商，遍及中下階層布衣平民，呈巨大之融涵包容力。

王韜作為十九世紀「海上知識社群」的樞紐人物，其傳奇生命經歷，已受學界公認為清末時期非循正途出身的一介落第秀才成為洋務與西學通人的代表範例，但本文更要提出，他的眾多著作中似乎隱藏著一條線索：自1870年代初期至1889、1890年近二十年的時間，持續不斷進行著與法國有關的史志或論著，換言之，對於歐陸名邦法國未嘗稍懈的持續關注，幾乎可以說貫穿了王韜一生中的壯年期精華歲月(44–61歲)。緣此線索仔細觀察其書寫法國及編撰述史志的過程，將之置諸於清季咸豐、同治與光緒三朝的時代文化語境、十九世紀末葉東亞漢文化圈與歐美國際情勢中，當能深度審視晚清時期的思想轉型與知識轉渡的各個階段，進而揭示「海上知識社群」的文化實踐與貢獻在近現代中國文學史與文化史的演變歷程中，不容忽視。

### 一、海上因緣：從「麥家圈」遙接歐美文化與世界圖景

相較於多數在太平天國之亂後避難來滬的江南文人，甫過弱冠(21歲)，其時仍以王瀚為名的王韜，於道光28年(1849)便離開蘇州甬直家鄉正式卜居上海，繼承父親王昌桂在英國倫敦會傳教士麥都思(Walter Henry Medhurst, 1796–1857)主持的墨

---

\* 呂文翠，國立中央大學中國文學系，副教授

海書館(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 Press)協助翻譯聖經工作，<sup>1</sup>堪稱最早謀食於滬城西人的第一代洋場文人代表。同一年，法國租界區繼1845年英國租界區、1848年美國租界區成立後，亦正式於上海關設，且逐漸成為與英美租界相互頡頏的繁華區塊。此三者，構成了鴉片戰爭後上海舊縣城以北「十里洋場」之泰西地景與歐美文化圖像的主要格局。

這當中，又以成立最早的英租界，以及活躍於1840–50年代上海文化圈的墨海書館傳教士與中國文士社群——亦可稱為「麥家圈」<sup>2</sup>知識社群——及其發行的中文報刊《六合叢談》(*Shanghai Serial*)，引起的思想啟發與東西文化交流最值得關注，有助於深入了解十九世紀上半葉來到南亞、東亞與中國的傳教士透過中文期刊傳教及間接傳播西學的經過。

追溯起來，1815年第一位來華的新教傳教士馬禮遜(Robert Morrison, 1782–1834)、米憐(William Milne, 1785–1822)與麥都思在麻六甲巴達維亞(今雅加達)即曾創辦中文期刊《察世俗每月統記傳》(*Chinese Monthly Magazine*)傳佈於南洋群島、泰國、越南等東南亞華人聚居區，在廣州、澳門一帶亦見流通，至1821年停刊前共出七卷。除了傳教的文章外，逐期刊載的國際時事新聞報導，成為後來的文化傳譯與西潮東漸的模式之雛型。在這樣的脈絡中，馬禮遜1833年於中國境內廣州創刊，由普魯士傳教士郭實臘(Karl Friedrich August Gützlaff, 1803–1851)署名「愛漢者」主編的《東西洋考每月統記傳》(*Eastern Western Monthly Magazine*)，總計發行33期，<sup>3</sup>則進一步從政治、歷史、經濟、科學，及世界地理概論等層面，為中國人打開了一扇眺望全球時勢與國際近況的視野。累積了這些發行中文期刊的經驗，麥都思於香港傳教時便發行了《遐邇貫珍》(*Chinese Serials*, 1853年創刊)，期刊除了傳教的文章，亦介紹了西學與新知，每期有關世界要聞與東亞近事的消息與報導，在東亞世界逐漸產生影響，如幕府末期的日本，這些中文刊物已見流通。<sup>4</sup>

此前籌辦中文期刊的豐碩成果，麥都思深知中文期刊的流播將改變傳統觀念並

<sup>1</sup> 《王韜日記》(北京：中華書局，1987)，頁4；另見王韜，〈與英國理雅各學士〉，見《毀園尺牘》(台北：文海出版社據「光緒二年丙子秋九月以活字版排印天南遁窟所藏」版印刷，1983)卷六，頁16a，總頁數257；參見游斌：〈王韜、中文聖經學翻譯及其解釋學策略〉，《聖經文學研究》第一輯(2007年)，頁356。

<sup>2</sup> 從地理位置而言，乃指以墨海書館為中心，與住宅五處、教堂和仁濟醫院同列之倫敦會總部，上海本地人以麥都思之名稱為「麥家圈」，約位於今之福州路、廣東路之間的山東中路。本文更側重論述此地吸納了來自江南地區的秉筆華士並釋出嶄新文化氛圍，逐步形成十九世紀中葉海上文化地標的「麥家圈」知識社群。

<sup>3</sup> 《東西洋考每月統記傳·導言》，見愛漢者等著，黃時鑑整理：《東西洋考每月統記傳》(據哈佛大學哈佛燕京圖書館藏本影印。北京：中華書局，1997)，頁5。

<sup>4</sup> 見松浦章〈《遐邇貫珍》中所見的近代東亞世界〉，收入氏著，鄭潔西等譯：《明清時代東亞海域的文化交流》(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9)，頁213–280。

能深入人心，故在上海時期，除經營墨海書館，以當時最先進的半機器鉛印活字版印刷技術出版中文聖經與西書外，1857年（咸豐七年正月發行第一期）創辦了由偉烈亞力（Alexander Wylie, 1815–1887）主編的綜合文藝期刊《六合叢談》，該刊每月發行一次，內容豐富，除基督教經文的闡釋外，舉凡地理、科學、政經、文化等類文章兼備，每期的「泰西近事述略」更具掌握與鳥瞰國際時事的新聞價值，在上海中文報刊的濫觴階段留下深刻印痕。

1857年麥都思回英後三天不幸猝逝，偉烈亞力便成為主持《六合叢談》的核心人物，因擔任刊物的總編輯而與書館華士密切合作。歷來最受稱道的是，科學素養深厚的偉烈亞力自1850年代即開始與多位墨海書館的華士合譯各種西學著作，如與王韜翻譯的《重學淺說》、《西國天學源流考》，<sup>5</sup>和李善蘭（1810–1882）<sup>6</sup>翻譯的《談天》、《幾何原本》，<sup>7</sup>都呈現出「麥家圈」西儒以傳教為目的出版中文刊物，透過評介西方最新科學思潮並試圖拉攏華人智識階層、與中國文化傳統融接的過渡期特徵。

#### （一）秉筆華士群與「麥家圈」文化圈——《華英通商事略》的撰著因緣

將目光鎖定在本文主角王韜，就會明白像他這樣具備秀才身分，科舉屢試不第，因「米珠薪桂，家食殊艱」，<sup>8</sup>不得已，在當時仍具爭議的歐美傳教士主持的教會機構為稻梁謀的「秉筆華士」，絕非孤例。除前述李善蘭外，經王韜引薦入館的忘年之交蔣敦復（1808–1867），<sup>9</sup>曾與英國傳教士慕維廉（William Muirhead, 1822–1900）合譯《大英國志》，三人可謂華士群箇中佼佼，名畫家胡公壽據此繪有「海天三友圖」；曾

<sup>5</sup> 王韜不僅翻譯，還撰寫介紹西學的論著，有《西學原始考》、《重學淺說》、《光學圖說》、《西國天學源流》、《泰西著述考》、《華英通商事略》，後收入《西學輯存六種》（光緒己丑十五[1889]年，淞隱廬校印本）。

<sup>6</sup> 李善蘭，字壬叔，浙江海寧人，因科考頻頻失利，遂至上海。1852-1866年受聘於墨海書館任編譯。同治二年（1863）被招致曾國藩幕中。同治五年（1866）曾國藩出資三百金為李善蘭刻《幾何原本》後九卷。1868年，入京師同文館總教習，執教演算法，前後八年。

<sup>7</sup> 李善蘭在墨海書館此譯出《代數學》這本世界數學名著十三卷，為中國第一本近代數學譯著，很快成為備受歡迎的教材；他所譯《代微積拾級》，也是中國首部介紹微積分的書籍；其他方面的著作尚有《植物學》、《談天》（天文學）、《重學》、《圓錐曲線說》、《奈端數理》，皆約為1852–1854年完成的著作，可窺見上海開明文人與第一波現代性思潮互動對話的模式。

<sup>8</sup> 《王韜日記》，頁15。

<sup>9</sup> 蔣敦復（1808-1867），寶山（今屬上海）人。原名爾鏗，字克父，一字劍人。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英軍入侵，蔣上書兩江總督牛鑾，獻策抵禦，因直言觸犯官員，險被逮捕，蔣避禍入寺為僧。鴉片戰爭結束，牛鑾被撤職查辦後，蔣還俗，浪跡大江南北。晚年寓居上海，常與當代名士交往，著有《嘯古堂詩文集》、《芬陀利室詞》。

與治好王韜足疾頑痾的英國傳教士合信 (Benjamin Hobson, 1816–1873)<sup>10</sup> 修譯醫書三種的管嗣復 (?–1860)，<sup>11</sup> 亦為王韜在墨海書館期間的摯友，他亦助美籍傳教士裨治文 (Elijah Coleman Bridgman, 1801–1861 年) 潤色修訂《美理哥合省國志略》，<sup>12</sup> 於 1861 年以《聯邦志略》書名重版印行，為 1850–60 年代晚清開明文士考證海外史地的重要文獻資源；近年來學界逐漸正視到與李善蘭同樣潛心於天文算學與格致之學的雲間 (淞江婁縣) 舉人韓綠卿 (名應陞，?–1862)，<sup>13</sup> 亦與王韜交往頻繁。咸豐九年 (1859) 初，他登門將親自手校且出資授梓的十五卷本《幾何原本》相贈，王韜展讀後，倍極讚譽。<sup>14</sup> 韓曾在《六合叢談》第肆號上發表過〈用強說〉，<sup>15</sup> 提出世局變動中萬物強弱相生相抑的原理，此文引發王韜在第七號發表了〈反用強說〉<sup>16</sup> 與韓商榷，間接證實其亦為廣義的「麥家圈」知識社群之一員。

這說明了儘管「麥家圈」華士群們未必卸下夷夏大防，委屈棲身在洋人處，乃出於下策，但求溫飽，時常有「去留尚不可知」<sup>17</sup> 的迷罔徬徨；對基督教的教理不以為然，時時質疑有悖儒教聖訓；<sup>18</sup> 即便與傳教士合譯格致書籍，但對科學觀念的接受度

<sup>10</sup> 此人為馬禮遜的女婿，曾在澳門、香港教會任職，1840-50 年代來到上海在墨海書館中譯書，1857 年任上海仁濟醫院 (Chinese Hospital) 醫生。參見忻平：《王韜評傳》(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1990)，頁 15。

<sup>11</sup> 管嗣復，字小異，江蘇上元人，管同之子。生年不詳，約卒於清文宗咸豐十年後不久。諸生，通算學，能文。太平軍踞金陵，嗣復陷城中，經歲始得脫。移家吳會，繼來滬上。主於英人合信。合信工醫術，嗣復亦雅好之，因譯醫書數種，為《西醫略論》、《內科新說》、《婦嬰新說》、《全體新論》風行海內。咸豐十年 (1860) 應聘往客山陰。未幾，吳門失守，蘇鄉風鶴頻驚，嗣復奔走道路，竟以憂卒。嗣復所為文章，附刊於父遺集《因寄軒文集》內。參見《王韜日記》，頁 97。

<sup>12</sup> 1859 年王韜回鄉參加歲考結束後回到上海，就對管小異助裨治文譯改《美里哥地志》的成果相當稱讚，認為「米利堅，新闢之地，人至者少，是編乃裨君紀其往來足跡所經，見聞頗實，倘得譯成，亦考證海外輿地之學之一助也」。見《王韜日記》，頁 107。

<sup>13</sup> 周振鶴〈《六合叢談》的編纂及其詞彙〉談及韓與墨海書館的成員有密切交往，見沈國威編著：《六合叢談 (附解題索引)》(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2006)，頁 166–170。另有鄒振環考證，韓氏為金山錢熙輔之婿，張文虎曾館錢氏家長達三十年，因與韓結為密友。見氏著：《晚明漢文西學經典：編譯、詮釋、流傳與影響》(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1)，頁 177–178。

<sup>14</sup> 《王韜日記》，頁 69；王韜有〈與韓綠卿孝廉〉書信亦可參照，見《弢園尺牘》，頁 98-99。

<sup>15</sup> 咸豐丁巳年四月朔日第肆號《六合叢談》頁七。見《六合叢談 (附解題索引)》，頁 576。

<sup>16</sup> 王韜此文署名王利賓，〈反用強說〉刊於《六合叢談》一卷九號，咸豐七年八月發行，頁八。見《六合叢談 (附解題索引)》，頁 657。

<sup>17</sup> 《弢園尺牘》，頁 69。

<sup>18</sup> 最常被學界引用的例子為咸豐八年王韜在日記所載與管嗣復詰問對話。當時教會請管氏參與翻譯《舊約聖經》，他堅辭不就，並表示：「終生不譯彼教中書，以顯悖聖人」，進一步解釋：「吾人既入孔門，既不能希聖希賢，造於絕學，又不能攘斥異端，輔翼名教，而

依然有限，如王韜曾致信好友，表達自己不喜西國語言文字，隨學隨忘，也對李善蘭所稱精通算學則可「探天地造化之秘，是最大學問」的說法不以為然；<sup>19</sup> 傭書西人，但傳統觀念的士子功名之心未嘗稍減，以王韜為例：十七歲時(1845)首次應縣考於崑山，取得第一等第三名的優異成績，隔年(1846)秋應鄉試於金陵，繳羽而歸，在〈與英國理雅各學士〉<sup>20</sup>的信中曾自白：此次赴試的挫敗經驗，遂自此摒棄帖括，絕意科舉。這個說法也曾在學界佔據主流，<sup>21</sup>但近年來因王韜早期日記與尺牘的詳細解讀，可考證1856年以及1859年，<sup>22</sup>亦即王韜在墨海書館供職階段，至少曾參加過兩次的科舉縣考。尤其1859年的日記中，王韜詳細記下崑山縣考每場考試的題目，<sup>23</sup>雖然日記中並未透露其科場失利的沮喪心情，但可想見其對此經驗耿耿於心，這也是文獻所顯示出王韜參加的最後一場科舉縣試。歸納可知，海上傭書十年，如王韜一般徘徊在仕進與時務之間的文士身影，恰恰呈現出「海上知識社群」成形初期猶疑艱難的步履。

饒是如此，王韜等人因緣際會地結識並深入交往「麥家圈」的西國傳教士群體：如前述的裨治文、合信、偉烈亞力、慕維廉、魏維頓(William Lockart, 1811–1896)、美魏茶(William Charles Milne, 1815–1863)、艾約瑟(Joseph Edkins, 1823–1905)、戴德生(James Hudson Taylor, 1832–1905)、林樂知(Young John Allen, 1836–1907)等人，使他們有機會間接參與了鴉片戰爭後上海文化圈第一波現代西學的引進與傳佈，並形塑了有別於傳統文士的思想特徵與文化實踐模式。故墨海書館不僅是在洋務運動時期設立「江南製造局翻譯館」之前，引介西方人文地理與科學新知最具影響力的機構，「麥家圈」交遊網絡亦無心插柳地培育出首批溝通中西之學的中國文士。更值得關注的是，即使收入不豐，「賣文」所得尚能維持生活，<sup>24</sup>但這些落第的江南秀才畢竟得益於海上一地，因中西文化衝突交匯而釋放出的就業機會，可選擇相異於

---

〔上接頁22〕

豈可親執筆墨，作不根之論著，悖理之書，隨其流、揚其波哉？」(《王韜日記》，頁92-93)，王韜本不以為然，然而最終仍被說服，並對傭書西人生涯頗為追悔。參見韓南撰、姚達兌譯，〈漢語基督教文學：寫作的過程〉，載《中國文學研究》，2012年第一期，頁10。

<sup>19</sup> 《王韜日記》，頁69。

<sup>20</sup> 《弢園尺牘》，頁257。

<sup>21</sup> 如柯文(Paul A. Cohen)與忻平皆持此看法。見Cohen, Paul A. *Between Tradition and Modernity: Wang T'ao and Reform in Late Ch'ing China*. (Cambridge, Mass.: Council on East Asian Studies, Harvard University: Distributed by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7), pp.10–11；忻平：《王韜評傳》，頁10–11。

<sup>22</sup> 王宏志：〈「賣身事夷」的王韜：當傳統文士當上了譯者〉，《復旦學報》(2011年第2期)，頁28。

<sup>23</sup> 《王韜日記》，頁94–107。

<sup>24</sup> 「今茲賣文所入，歲得兩百金」，《弢園尺牘》，頁69。

過去功名無成的士子既定營生方式，在洋場覓得棲身之所，這意味著新型態「以文治生」的方式將使他們逐步在上海掙得一席之地。

如前所述，墨海書館時期的王韜曾助偉烈亞力編《六合叢談》，與艾約瑟、偉氏共同翻譯諸種格致書籍，故亦頗留心本地文士出版介紹西學的書籍（如與韓綠卿的交往）。他曾與偉氏共同撰述《華英通商事略》，<sup>25</sup>細數自明萬曆年間至清道光年間英國東印度公司（英「東方貿易公局」）來華經商貿易的曲折，詳述鴉片戰爭的遠因近事：

壬午（筆者按，即道光二年，1822），鴉片土船自澳門進泊伶仃，售銷甚利，以粵有司不行，嚴禁也。有司官欺罔貪婪，不能杜弊除害，中國人屢次為鴉片船砲傷命，屍親陳訴于官。官既與船商曖昧，無顏訊明，公局不預其事，有思貿易道廣，何必專於一粵海口。于是公局遣一印度船勞亞默爾思，以各貨物與能華言者，俱泛海入廈門、福州、甯波、上海，繞道至高麗、琉球，往返六月有餘。<sup>26</sup>

這段文字述及鴉片戰爭之起因有商船、華官與英政府各方勢力的角力；在1859年的日記中，王韜重新提及此書，<sup>27</sup>並分析清末英商於粵東與沿海港口貿易的始末：

英自康熙時在粵通商設立公局，直至嘉慶間，未嘗一得志，蓋其時國中多事，米利堅義民叛於內，法蘭西強鄰逼於外，印度未取，國且中弱，故無暇與中國為患。至道光時，君位已安，民心已固，財富兵強，駸駸自大智謀英杰之士如馬禮遜、義律、羅伯聘輩接踵而至粵，效中國之語言文字，漸有窺伺之心，而大逞其所欲為。即無焚烟之舉，亦將別啟釁端，故不得盡為林文忠公咎也。<sup>28</sup>

這段話除了剖析第一次鴉片戰爭的導火線——林則徐於虎門銷焚禁烟事件——僅是表面因素，此事的背後根由，乃是西方貿易公司與跨國大型企業，往往挾國家武力為後盾進行商業活動。換言之，清廷面對的不僅是國際貿易的競爭，更是國與國間的殘酷角力，要如何回應這些來自海上的威脅，必須對「夷情」有嶄新的觀照視野，善用歐美列強的利益衝突，以爭取有利條件。日記中他更提及英法聯軍戰後訂定天津條約，面臨英、法、美、俄瓜分中國之嚴峻情勢，當務之急乃是如何在國際中自振自強。

<sup>25</sup> 該文自咸豐丁巳年二月至九月（1857年1至8月）逐次登載。見《六合叢談》一卷2號、一卷6號、一卷7號、一卷8號、一卷9號、一卷10號。

<sup>26</sup> 第六期〈華英通商事略〉末段文字，見《六合叢談》一卷10號，頁10b。

<sup>27</sup> 咸豐九年四月七日丁未的日記載：「余謂近所著《六合叢談》，中有《泰西通商事略》一卷，載其貿易粵東顛末甚詳」，此所謂《泰西通商事略》即為《六合叢談》上連載共六期的〈華英通商事略〉集結成冊。見《王韜日記》，頁114。

<sup>28</sup> 《王韜日記》，頁114。

今在廷諸大臣，無一人能熟稔夷情者。制夷之善法，莫如勿當其鋒，而承其敝。譬諸春秋之時，夫差爭長黃池，方欲逞志於晉，而不虞越之襲其後也。滿必覆，驕必敗，天道然也。英得志於中國日益甚，則與國忌之日益深。今泰西戰爭方始，英自以雄國無役不與，則甲兵必日鈍，財用必日匱。耀兵疆場，興戎肘腋，未可知也。然後中國審機以發，觀釁而動；或以夷間夷，或以夷攻夷；惟我所用，皆足以制其死命而安受其燼。若今以積弱之勢，而當此至凶之鋒，多事之秋而復增一至強之敵，是未明乎事之緩急、勢之利害、時之盛衰也，雖愚者亦不出此也。<sup>29</sup>

王韜自己也承認，此時中國的積弱不振，難行「審機以發，觀釁而動，或以夷間夷，或以夷攻夷」之策，計需二十年後，方能達此境。

在墨海書館共計十三年的生涯，對中西政治型態的比較更為深入，他曾向蔣敦復批判道：「西國政之大謬者，曰男女並嗣也；君民同治也；政教一體也」。<sup>30</sup>偉烈亞力聞之，有如下一番辯駁，王韜亦載之於日記中：

泰西之政，下悅而上行，不敢以一人攬其權，而乾綱仍弗替焉。商足而國富，先欲與萬民用其利，而財用無不裕焉。故有事則歸議院，而無蒙蔽之虞；不足則籌國債，而無捐輸之弊。今中國政事壅于上聞，國家有所興作，小民不得預知。何不仿行新聞月報，上可達天聽，下可通民意。況泰西之善政頗多，苟能效而行之，則國治不難。<sup>31</sup>

此處王韜借外人之口來簡介乃至肯定當時尚不為國內知識界所瞭解熟知的泰西政治體制，雖然他接著提出「新聞月報」在地小民聚之泰西諸國較易施行，中國地大則恐電氣密機難以通行，此法猶待商榷。這說明他對泰西學術崇尚實學的認識外，持保守態度地比較「中外異治」的緣由，雖未見得脫出徐繼畲《瀛寰志略》與魏源《海國圖志》二書「中體西用」的格局，卻也勾勒出1850–60年代海上知識圈熟稔西國近事，熱中觀察泰西諸國勢力消長與角力關係，並企圖深入追索緣由的思維輪廓。

## （二）遁跡香港與走向世界——《普法戰紀》與東亞開明知識圈

當王韜逐漸融入麥家圈文化群體的同時，太平天國軍陸續攻陷杭州、常州、蘇州、嘉興等江南名城，並有步步進逼上海之勢。這段期間的日記，均可見王韜為戰火肆虐江南，蒼生慘遭屠戮，百姓流離失所的哀憫悲歎，滬地也湧進了一波波的難

<sup>29</sup> 同前注，頁115。

<sup>30</sup> 同前注，頁113。此段議論也在王韜日後撰寫《重訂法國志略》一書中再度出現，詳見本文第三節分析。

<sup>31</sup> 同前注，頁113。

民。「海上彈丸地，奔投趨避於此者者，實繁」；<sup>32</sup>相對地，官軍將帥指揮無方，或有焚城以拒賊兵，或有士卒敗陣潰逃的消息亦屢屢傳來，與王韜常往來的管嗣復、李善蘭、蔣敦復、龔孝拱、管子駿、梁閔齋、周弼甫等滬地文士，聞之無不痛切激昂：「嗚呼，至今日兵驕將惰、民窮餉匱、文武恬嬉、上下因循。雖有善者，亦無如之何已！」可見其對清廷政治腐敗、諸臣於洋務昏然蒙昧與社會亂象的不滿。<sup>33</sup>

同治元年(1862)回鄉探親時，王韜化名黃畹向太平天國的蘇福省民政長官劉肇獻策，<sup>34</sup>詳述攻克上海的具體謀略，未料此書中途為清軍截獲，朝廷以通賊的嫌疑犯通緝王韜。因上海道台吳煦積極緝捕，當時的英國領事，亦是王韜的前雇主麥都思的兒子麥華陀(Walter Henry Medhurst, 1823–1885)出面斡旋奔走。王韜匿跡領事館135天，<sup>35</sup>最後在麥華陀與香港英華書院(Ying Wa College, 舊稱Anglo-Chinese College)的院長理雅各(James Legge, 1815–1897)的聯繫下，於10月悄悄搭船前往香港避禍，此去一別就是23年，王韜也自此展開人生另一段風景。

在香港期間，王韜花了不少時間面對新的生活環境，以遭貶流謫自況的他，易「瀚」名為「韜」，寓所號為「天南遁窟」，意在從此潛心晦跡，隱耀韜光，不復出問世，<sup>36</sup>但縈繞心懷的追悔自咎情緒未嘗稍減：「已知成棄物，何得尚談兵？殺賊雄心在，還鄉噩夢驚」。<sup>37</sup>在這種心緒之下，香江的風物自然入眼皆悲：「我初來時厭此土性惡，常畏煩熱委頓病泄嘔。瘦妻嬌女啼哭思舊土，一家四人臥床無一瘳。半椽矮屋月費半萬錢，風逼爨烟入戶難啟眸」。<sup>38</sup>但這段初期來港適應困難的日子過不多久，王韜已漸漸與香江本地的開明知識社群頗有往來。當時他主要的工作內容跟墨海書館階段的「傭書」方式略有不同，除了在教會機構中協助翻譯宗教典籍外，最重要的工作是幫助理雅各完成中國儒家經典如《書經》、《詩經》、《左氏春秋傳》等等的翻譯工作，<sup>39</sup>同時也與英華書院中負責印刷事務，曾赴美就學，後擔任上海廣方言館英文教席的黃勝(字平甫)、在港創辦最早中文報紙《華字日報》的陳藹廷、西文日報主筆

<sup>32</sup> 同前注，頁179。

<sup>33</sup> 同前注，頁151–152。

<sup>34</sup> 王韜撰，王稼句點校：《漫遊隨錄圖記》(濟南：山東畫報出版社，2004)，頁3。

<sup>35</sup> 見上海通社編：《舊上海史料匯編》上冊(北京：北京圖書館，1998)，頁682。

<sup>36</sup> 參見忻平：《王韜評傳》，頁74–75。

<sup>37</sup> 王韜於同治元年(1862)逃亡至香港後寫下的日記，壬辰四月二十六日(10月19日)。見王韜：《悔餘漫錄》，收入《王韜日記》，頁197。

<sup>38</sup> 王韜：《悔餘隨筆》，收入《王韜日記》，頁211。

<sup>39</sup> 王韜與理雅各長達11年的合作關係，在理雅各晚年出版的五巨冊《中國經典》(The Chinese Classics)中體現出關鍵性的影響，造就了理雅各在西方漢學界的崇高地位。見Norman J. Girardot, *The Victorian Translation of China: James Legge's Oriental Pilgrimage*.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2), pp.60–61. 另見Lauren F. Pfister, *Striving for the Whole Duty of Man: James Legge and the Scottish Protestant Encounter with China*. (Frankfurt am Main & New York: Peter Lang, 2004), vol.1, pp. 158,230; vol.2, pp. 200–204.

張宗良(字芝軒)，廣東仕紳名流如容閔、鄒誠(字夢南)、何玉祥、梅籍、陳桂士等人頗為契合，種下了王韜在香港創辦中文日報(1874年創立《循環日報》)與編譯泰西史志的因緣。

1867年理雅各回英國蘇格蘭家鄉省親，由於仍有多部中國經典的翻譯尚未完成，遂邀請王韜偕同赴英佐譯五經。在年底成行的這趟目的特殊的歐遊之旅，王韜曾兩度行經法國，驚嘆其國力鼎盛，首都巴黎繁華富足，訪問了法國漢學家儒蓮(Stanislas Aignan Julien, 1797–1873)，兩人當時的筆談與後來通信中，他曾向蓮儒提及法國史志在中國付諸闕如，企盼兩人能共同修撰法史以「俾中國好奇之士」。<sup>40</sup>此事雖無下文，這樣的構想亦因儒蓮過世而未能實現，但已顯示出王韜對法國歷史的情有獨鍾，埋下他日後獨力撰著《法國志略》的因緣。

居住在蘇格蘭長達兩年的王韜，譯書之暇漫遊各地，直到1870年春回港。衡諸晚清中國，當時比王韜更早踏上歐陸的僅有清廷派遣的斌椿父子之出使團，鴉片戰爭後、甲午之戰以前非官方或半官方派遣的出洋團隊中，王韜一介布衣的身分在英國長達廿八閱月佐譯五經，<sup>41</sup>確為眾多為公為私的遊歷者中所僅見。有別於走馬看花的掠影印象或制式化的官方行儀，王韜這趟歐洲之行，不管是逆旅途中自由地走訪歐洲各地名勝，或在英國期間可以近距離觀察國俗民情，種種切身經驗，大幅度開拓了他的胸襟與視野。

同治九年下旬(1870)，亦為王韜結束歐遊之旅回到香港後半年，即爆發普法交兵戰事(1870–1871)。王韜驚詫歐陸霸主法國在戰役中慘敗，有感於與泰西諸國與國際情勢的巨變，遂參照香港的西文報刊資料著手完成了近代第一部記述海外戰爭的史著《普法戰紀》，此書刊未刊之前抄本早已流傳，印行後更引起廣大迴響，奠定了他鼓吹思想啟蒙與社會變革的知識領袖地位。

從報刊資料著眼，自同治十一年九月初一日(1872年10月2日)起，上海的《申報》刊出了〈普法戰紀〉，一直到同治十二年的六月十二日(1873年8月4日)，只要翻開《申報》，很難忽略王韜的《普法戰紀》。《普法戰紀》不定期於《申報》上刊出長達11個月之久，總計25篇長文，幾可視為草創初期的《申報》上持續連載最久的專題論說。半年後(1874年初)，《申報》更陸續刊登《戰紀》的書籍廣告，申報館遍布全國近廿餘處的售報點也寄賣在香港已付梓刊行的14卷《普法戰紀》。<sup>42</sup>

除了刊登將近一年書籍廣告外，《申報》主筆更專文推介，文末呼籲「還望諸名士於讀史之暇，採訪他國史事，繙譯成文，流傳各省」。<sup>43</sup>全書發售後一個月不到，報館亦有針對全書總體的短評，強調該書「閱之令人識見為之大擴，心志為之舒暢，外

<sup>40</sup> 王韜：〈與法國儒蓮學士書〉，《弢園尺牘》，頁308–309。

<sup>41</sup> 王韜：〈代上丁中丞書〉，《弢園尺牘》，頁322–323。

<sup>42</sup> 見《申報》1874年1月8日至1874年11月9日，長達近一年。詳見拙著《海上傾城：上海文學與文化的轉異，1849–1908》(台北：麥田出版社，2009)，頁86–88。

<sup>43</sup> 〈讀普法戰紀書後〉，《申報》(同治12年3月25日)，第一頁。

國之事，未嘗有如是書可以譯供眾覽者」；<sup>44</sup>一週後另一篇頗具分量的書評隨即推出，讚譽王著「用筆之簡古，敘事之變化，幾可與左氏龍門比烈，實屬繙譯西書中之特出者，真可為西史增光，定能傳世於無窮」，<sup>45</sup>都說明該書引起朝野人士矚目。再從《普法戰紀》自1873年於香港中華印務總局印行後，隔年即由申報館寄售，不到一個月便有番禺士人李光廷將之刪纂為四卷的《普法戰紀輯要》；1878年日本陸軍文庫出版印行《普法戰紀》；1886年、1895年、1897年皆有「遯叟手校本」（王韜自號遯叟）的發行。可見自1870–1890年代末葉，此書長銷達廿餘年，其對同治、光緒年間開明知識圈的影響，不言可喻。

與成書後長達十四卷的《普法戰紀》相比較，《申報》上的連載只敘述至普軍攻入巴黎城即戛然而止，但已呈現出香港報界與上海文化圈的聲息與共，說明了1870年代以上海為中心的文化思潮將擴及東亞世界知識圈。與中國同樣處於政、經、社會轉型期的日本知識界對《普法戰紀》興趣濃烈，可謂該書正式開啟了晚清「海上知識社群」與明治維新初期的日本朝野智識階層的交流對話契機。

## 二、東亞報刊界及知識社群的互動對話

### （一）「報知社」與《朝野新聞》

對日本的知識界來說，《普法戰紀》未出版之前，魏源《海國圖志》與徐繼畲《瀛寰志略》一直是政界、軍方與知識圈了解西方並奉為圭臬的重要典籍，王韜曾身履目睹歐洲文化風俗的特殊經歷，透過西文報刊動態地掌握泰西世界的最新實況，皆使《普法戰紀》突出於日本當代相關的西方史著與地理書，種種緣由，促成了王韜於光緒五年閏三月初七日（1879年4月23日）從香港道經上海，轉赴一衣帶水的東瀛。

邀請王韜訪日的靈魂人物，亦為「報知社」的社長與主筆栗本鋤雲（別號匏菴）<sup>46</sup>有〈王紫詮の來遊〉一文，提及該《普法戰紀》乃其子貞次郎隨岩倉大使（岩倉具視）遊歐而還，途經上海所購得。栗本展讀未及半部，便覺此書能脫漢人議論之俗套。後「陸軍省文庫」欲刻此書付梓，邀栗本訓讀其中二卷，可知栗本鋤雲不僅為此書最早的東瀛知音之一，更間接促成了該書在日本的首刻付印（陸軍文庫於明治十一年[1878]出版）。

龜谷行為王韜的行旅日記《扶桑遊記》所撰跋文，進一步詳述邀請王韜赴東瀛的

<sup>44</sup> 〈讀普法戰紀〉，《申報》（同治12年11月28日），第二頁。

<sup>45</sup> 〈讀普法戰紀書後〉，《申報》（同治12年12月6日），第一頁。

<sup>46</sup> 栗本鋤雲（1822-1879），名鯤，字化鵬，號鋤雲，別號匏菴，漢學家，著有《鉛筆紀聞》、《曉窓追錄》，受「報知社」所聘，任日報編輯主筆。〈王紫詮の來遊〉（原文為日文）見栗本匏菴著，日本史籍協會編：《匏菴遺稿》（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昭和50[1975]），頁292–293。

緣起與相關人士商量細節的經過。<sup>47</sup>文中提到的幾個關鍵人物：栗本匏菴、曾派駐朝鮮的外交官，亦為漢文期刊《明治詩文》的主編佐田白茅、東京圖書館館長岡鹿門（名千仞）、<sup>48</sup>文學家龜谷行、重野安繹（字成齋，時任修史館編修），皆為明治維新初期開明知識群的代表人物。除了東道主「報知社」外，經常援引轉錄王韜在香港創設的華文日報《循環日報》中詩文或新聞消息的東京報紙《朝野新聞》<sup>49</sup>（創辦人與主筆為幕末名士成島柳北），也在王韜訪日期間，同步刊載不少王韜與日本友人如增田貢（岳陽）往來酬酢的詩文。<sup>50</sup>有趣的是，明治十二年六月十六日《朝野新聞》第三版「論說」一欄，有〈支那ノ新聞記者ノ給金多少〉一文，即針對傳聞所云香港大報社《循環日報》社長王韜受聘赴日之行，所得酬薪僅為二百金，委實甚寡，據此推測華人報社主筆的薪資與日本報社記者的待遇兩相比較，日本記者收入尚屬豐厚。<sup>51</sup>不管這些報上的議論是否僅可視為談資流言，都側面說明了王韜在日期間的文化活動及與中日文士交遊往來，受到當時新聞界與開明文士的矚目。

<sup>47</sup> 龜谷行，《扶桑遊記》上卷跋文。見沈雲龍主編，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第六十二輯《扶桑遊記》（台北：文海出版社，1971），頁67-68。

<sup>48</sup> 岡千仞（1833-1914），字天爵，又字振衣，號鹿門，日本宮城縣仙台市人。出身武士家庭，卒業於當時的最高學府昌平黌，精通漢學與西學，明治維新後，曾任修史館編修官，東京府書籍館幹事等職。當時與駐日公使何如璋、黎庶昌以及其他使館成員，訪日的王韜等人均與其有密切交往。1884年5月來華，以上海為中心漫遊南北各地近一年，著《觀光紀遊》、《觀光續紀》、《觀光遊草》等日記載來華觀感。著有《米利堅志》、《尊攘記事》、《法蘭西志》、《藏名山房文集》、《涉史偶筆》等著多種。

<sup>49</sup> 見《朝野新聞》明治十二年五月十九日第四版第一欄引錄「支那使臣張斯桂氏東京雜詩（循環日報）」五首；五月二十四日有「張斯桂氏東京雜詩之續」；五月二十八日有〈張斯桂氏東京雜詩之續〉。另，同年十月二十四日第四版有〈循環日報中我邦ノ毒婦阿傳ノ詩有錄シラ看官ニ示ス〉錄出王韜所撰〈阿傳曲〉長詩。此事見錄於王韜的《扶桑遊記》中（頁106-110），後來於上海《點石齋畫報》第七號刊出《淞隱漫錄·記日本女子阿傳事》。

<sup>50</sup> 這些詩文若參照王韜的日記《扶桑遊記》，會發現《朝野新聞》幾乎相隔不到一周便刊出王氏與日本友人往來酬唱的詩文，可見朝野新聞社筆政群與王韜的密切關係。如四月初六日王韜記下與張魯生（斯桂）副使、漆園琴仙昆仲，至增田岳陽家，小飲小有亭，詩酒歡聚（見《扶桑遊記》，頁64-66）。席間詩歌贈答均刊登在明治十二年五月三十一日《朝野新聞》第四版第一欄。（有王韜〈與岳陽增田君書〉一文與〈四月六日，集於岳陽先生鳴謙齋。同集者，張魯生公使，王漆園、琴仙昆仲及余。主人先有呈公使詩，因步韻錄呈〉、張斯桂〈次岳陽先生韻〉兩首詩）。當日增田岳陽即席附贈一律，則與王治本（號漆園）之詩刊登於六月三日《朝野新聞》第四版第一欄（王治本〈和岳陽先生玉韻〉、增田岳陽〈魯生張公使見訪酒間賦贈〉及〈贈紫詮王詞宗〉三詩）。另，同年十一月六日《朝野新聞》第四版錄出王韜題日本漢學家森春濤之子森槐南的〈題補春天傳奇〉序，此文亦曾見錄於《扶桑遊記》六月二十七日的日記（頁169-170）。

<sup>51</sup> 見明治十二年六月十六日《朝野新聞》，第三版至第四版。該文可中譯為〈中國報社記者薪水之多少〉。

觀察王韜在日本密切往來的友人，除上文提及的日東文士外，留學英國的學界名士中村正直、<sup>52</sup>時任崎玉縣教諭的木原先禮、《萬國史記》作者岡本監輔、清史家增田貢、<sup>53</sup>任高崎知縣的源氏後人大河內輝聲（源桂閣）、漢學家森春濤等人，可說明治初期朝野各界與開明知識社群的代表人物，皆不約而同前來與享有盛譽的王韜晤面筆談，詩賦往返。王韜將這段遊歷的詳細經過以日記體裁記述於三卷《扶桑遊記》中，現在看來，此書鳥瞰地速寫明治維新十餘年後（時為明治十二年）日本政經社會與文化狀況，與王韜交往的各界知識菁英群象提供橫剖面，更讓我們了解東亞國家與泰西思潮衝擊、碰撞的摸索經驗，記錄了同樣身處社會劇烈變動期的中、日文化人之對話交流過程。

結合《扶桑遊記》的視野，回過頭來看《普法戰紀》，清楚披露該書與當代「世變」思潮接軌的歷史敘述，深深地打動了新舊轉型期的日本知識分子之心靈。在這樣的理解之下，重野安繹與王韜筆談時雖讚譽他為「今時之魏默深」，卻更從符合時代實際需求的觀點剖析《戰紀》與廿年前的《海國圖志》之別：

默深所著《海國圖志》等書，僕亦嘗再讀之，其憂國之心深矣。然於海外情形，未能洞若著龜，於先生所言，不免大有逕庭，竊謂默深未足以比先生也。<sup>54</sup>

王韜則自認為兩人的關鍵差異在於：

當默深先生之時，與洋人交際未深，未能動見其肺腑。然師長一說，實倡先聲，惜昔日言之而不為，今日為之而猶徒襲皮毛也。<sup>55</sup>

可見魏源《海國圖志》的地位在日本固然崇高，但在海外情勢的深入了解方面，《普法

<sup>52</sup> 1871年，中村正直翻譯19世紀英國思想家斯邁爾斯(Samuel Smile)的《自助論》(Self-Help)，並以《西國立志編》為名，將此書付梓出版，即轟動東瀛。此外，他亦曾翻譯穆勒(John Stuart Mill)的《自由論》(On Liberty)。參見王晴佳：〈中國近代「新史學」的日本背景——清末「史界革命」和日本的「文明史學」〉(《台大歷史學報》12卷32期，2003)，頁197。

<sup>53</sup> 增田貢，字岳陽，曾著《清史攷要》，該書剖析晚清上海政局時提及王韜的貢獻，文曰：「吳郡處士王韜，獻策曰：招募洋兵，人少餉費，不如以壯勇充數，而請洋官領隊。平日以洋法，教演火器，務令精練，西官率之以進，則膽壯力奮，似亦可收効於行間。於是遂有洋槍隊之設，號為常勝軍」，見《清史攷要》(東京：別所平七，明治10[1877]年出版)卷之六，頁1b-2a；頁1b眉批：「王韜 洋法練兵策」。

<sup>54</sup> 《扶桑遊記》上卷，頁48。

<sup>55</sup> 同前注，頁48-49。

戰紀》顯然睥睨於同期各類相關史籍。<sup>56</sup>故曾撰美國、<sup>57</sup>法國、英國相關史著的岡千仞，推崇王韜為「當世偉人」，<sup>58</sup>除因《普法戰紀》精準道出當代國際情勢風雲變幻之外，王韜「慨歎歐人眈眈虎視，親航歐洲，熟彼情形，將出其所以施之當世」<sup>59</sup>的懷抱，與岡千仞對世界情勢和未來動向的體察頗有契合方為主因。<sup>60</sup>後來王韜從日本回到香港，繼續著手法國史志，除了參酌《西國近事彙編》（主要記載同治癸酉年[1873]泰西近事），<sup>61</sup>岡本監輔的《萬國史記》外，大量取資參考的便是高橋二郎抄譯，岡千仞刪定的《法蘭西志》。<sup>62</sup>

總結來看，近四個月的扶桑之行，固然是自《普法戰紀》輻射出而交織形成的一場中日文士的對話，亦與王韜數十年來的泰西經驗形成互為鑑鏡與相嵌連結的微妙關係，體現在日後《重訂法國志略》的編纂方式與寫作模式中。此「日本經驗」更因為

<sup>56</sup> 王晴佳分析：魏源的《海國圖志》除了將日本三島的地理位置與相互關係弄錯外，該書觀念上仍將中國視為天下的中心，而當時世界形勢的變化，使這種世界觀與歷史觀顯得落後於時代。見〈中國近代「新史學」的日本背景〉，頁203。

<sup>57</sup> 岡千仞曾與河野通之根據美國格堅勃斯(Quackenbos, G. P. [George Payn], 1826–1881)原文而撰譯《米利堅志》(東京：博聞社、光啟社發行，明治六年[1873]十二月出版)。其例言云：「原書米人格堅扶氏所撰。通之以其過略，參觀瀛環志略、聯邦志略、萬國公法、格物入門等書，間有可取，竝載以補之。」(岡千仞，《米利堅志》例言)。岡千仞完成書稿後，「會小牧偉卿隨欽差大久保大臣赴支那北京，因寄一部于駐紮公使柳原君請諸名流評閱」(見《米利堅志》岡千仞於李序後補述語)，當時任北京同文館天文算學掌教的李善蘭受美國在華傳教士丁韞良(William Alexander Parsons Martin, 1827–1916)所囑，為該書作序；岡千仞於1884年遊歷中土，至北京時赴同文館拜見丁韞良，亦再度提及當年將《米利堅志》就教於丁氏的因緣(見岡千仞：《觀光紀遊》[台北：文海出版社，1971]，頁152)。

<sup>58</sup> 岡千仞，《扶桑遊記》下卷跋文。

<sup>59</sup> 同前注。尤其是兩人著作均主張的「俄國威脅論」。

<sup>60</sup> 翻閱岡千仞所著《藏名山房文初集》，除有〈與王紫詮書〉(卷四，頁18a至19a)、〈扶桑遊記跋〉(卷六，頁4b-5b)兩文可見其與王韜交往密切外，亦見數文之末附有王韜的短評讚語，如卷二〈尚不愧齋存稿序〉(頁4b)、〈白山文集序〉(頁9b)、卷六〈三好清房臨絕書牘跋〉(頁4a)、〈書斯文會告文後〉(頁13a)，足見兩人詳閱彼此著作的深度交流。見岡千仞著：《藏名山房文初集》(東京：岡百世，大正九年[1920]出版)。關於岡千仞與王韜的交往與兩人思想之異同，學界已有詳細討論，如易惠莉：〈日本漢學家岡千仞與王韜——兼論1860–1870年代中日知識界的交流〉(見《近代中國》，第12輯，2002年12月)、徐興慶：〈王韜與日本維新人物之思想比較〉(見《台大文史哲學報》第64期，2006，頁131-171)；另，鄭海麟披露了王韜致信岡千仞的書信內容(見氏著《王韜遺墨》，見《近代中國》，第9輯)；〈王韜、黃遵憲與日本岡鹿門的文字因緣〉，《近代中國》，第9輯)在在說明兩人非同一般的深厚交情。

<sup>61</sup> 見(美)金楷理口譯，姚棻筆述(第一至三卷)、蔡錫齡筆述(第四卷)：《西國近事彙編》(上海：上海機器製造局刊印，同治十二年，1872)。

<sup>62</sup> 見王韜，《重訂法國志略》，凡例一。

近代報刊跨疆域與跨文化的特徵，中日知識圈不約而同著重當代史與經世致用之學，呈現東亞國家企圖擺脫舊傳統，在追求現代化與文明圖景過程中不免徬徨迷惑，卻仍汲汲於尋思對策的思維特徵。

## (二) 重返滬上：《法越交兵記》與中、日、越的思想激盪

從日本回香港後過了四年，即光緒十年(1884)，王韜在傅相李鴻章的默許下回到睽違廿餘年的上海。該年，滬地報刊之激烈競爭因申報館《點石齋畫報》的刊行進入新的階段。衡諸該畫報在上海的暢銷風行，實與當時閱眾渴望「即時」得知1884年爆發的中法戰爭，關係至為密切，《點石齋畫報》上第一期(1884年4月)刊出的頭幾幅圖便是有關中法戰役的繪像(如「力攻北寧」、「輕入重地」的戰況圖繪)，此後旬日發刊，連續幾期皆有顯目的中法戰役實際戰況的圖像。

報刊界掌握民眾們對中法戰況的好奇心態，標榜對時事、要聞「圖像式」的即時掌握，使《點石齋畫報》迅速成為「申報館」跨足出版業賣相最佳的大眾讀物，說明了上海讀者對資訊的傳播與時事要聞的時效性要求之與日俱增；上海另一大中文報《字林滬報》為了與之競爭，報紙頭版連續幾日刊登安南的形勢圖繪，剖析中法戰況、刊出黑旗軍將領劉永福的畫像，<sup>63</sup>均見滬地報業企圖拉攏市民讀者的銷售策略，漸漸成為經營報刊文化事業不可或缺的一環。

佐以報刊資料，會發現在日趨白熱化的報刊角力場中，王韜非但參與其中，甚且擔任要角：《點石齋畫報》第六號上刊出並連載的「聊齋體」文言小說《淞隱漫錄》即出自王韜之手，過了三年，《淞隱漫錄》尚未登畢，<sup>64</sup>他的歐土遊歷記《漫遊隨錄》(亦為文圖對照)亦加入連載的陣營。1887年10月2日《申報》頭版刊有〈一百二七號畫報並新增漫遊隨錄圖記出售〉的告白，說明日後畫報之首增加王韜《漫遊隨錄》，與畫報末尾的《淞隱漫錄》相互呼應，並逐期連載至1889年底。可說從1884到1889年長達五年的時間，王韜的作品一直以旬日刊出、圖文對照的方式，持續在滬上最暢銷的通俗畫報上曝光。

前文已分析《點石齋畫報》的暢銷與市民讀者欲即時得知中法戰爭的消息有直接關係，乍看起來，王韜的《淞隱漫錄》屬「聊齋體」文言小說，似不具備反映當代社會的文學成分，可若仔細閱讀此書各個篇章，便會發現它相當程度融合王韜的海外遊歷經驗，一新讀者耳目。如〈海外美人〉、〈海底奇境〉與〈海外壯遊〉中的主人公，皆好汗漫遊，他們遊歷東西洋時，除了豔遇不少，屢與外國女子譜出戀曲外，更曾踏

<sup>63</sup> 《字林滬報》1884年3月15日、3月17日、3月22日、7月10日(劉永福畫象)第一頁頭版。相關論述參見張純梅：《第二代洋場才子的文化創新：蔡爾康與字林滬報研究(1882-1888)》(中壢：中央大學中文系碩士論文，2012)，頁83-92。

<sup>64</sup> 據筆者考察，王韜的《淞隱漫錄》一直在《點石齋畫報》上刊登到1888年才結束，這期間也還有《漫遊隨錄》在同一畫報連載。詳見《海上傾城》，頁200-204。

足歐土著名城市的建築與地標：博物院、玻璃巨室、圖書館、機器局等。〈海底奇境〉中的女主人公為瑞士女子蘭娜，她家資鉅富，藏有法國廢后的宮廷珍寶，並贈與男主人公助他度過劫難；〈海外壯遊〉更可見王韜將自己在歐洲兩年餘的生命經驗融入，<sup>65</sup>男主人公錢思衍隨一道士修行，道士以法術示現幻境，錢在幻境中翩然飛抵英倫與巴黎，與兩位西方美人同遊兩座車馬闐闐的泰西大城等等情節，均可見小說家獨特的海外視野已開拓了晚清志怪傳奇體的新境界。

王韜在《點石齋畫報》上刊登的小說集與歐遊回憶錄《漫遊隨錄》，雖有不少篇幅描述在巴黎的所見所聞，與該書的敘述重心——英國——相映成趣，構成王氏筆下具體而微的泰西文明景觀，乍看並未直接提及中法之役，亦無專文評議。但若橫向考察，觀察他返滬後與日東文士的交遊，就會發現他與「興亞會」<sup>66</sup>創立者之一日本文士曾根俊虎（1847–1910，號嘯雲）<sup>67</sup>合著的《法越交兵記》<sup>68</sup>——該著封面內頁並列三位作者：「大日本曾根嘯雲輯著 大清王韜仲弢刪纂 越南阮述荷亭校閱」——便可窺見王韜關注法國擴張對外殖民地之心未嘗稍懈，並以自身和洋人打交道的經驗，從歷史之縱深與衍變的視角著手刪纂日本文士著作，復將此心得累積為五年後成書的《重訂法國志略》內容。

<sup>65</sup> 如王韜在英期間曾拜訪在香港創立日報的報界大老德臣（Andrew Dixon, ?–1873），便化為小說中人錢思衍在英國所遇曾至中國故能華語者；小說描述錢遊歷倫敦的博物院、藏書室與機器房、製造局及玻璃屋，並在巴黎的法宮參觀珍寶「金剛鑽石」等等，皆可看出王韜將身履其地的歐遊體驗融入小說情節的痕跡。

<sup>66</sup> 王韜致岡千仞信函中曾提及他與興亞會成員的交往：「聞貴國有志之士，近日初設興亞會，此誠當務之急，而其深識遠慮，所見之大，殊不可及。……其執興亞會中牛耳者，為曾根俊虎、伊東蒙吉，咸願納交于弟，通縞紵而結苔岑焉」。引自鄭海麟：〈王韜、黃遵憲與日本岡鹿門的文字因緣〉與〈王韜遺墨〉兩文。二文俱見《近代中國》第9輯，頁130、131、138。

<sup>67</sup> 曾根俊虎，號嘯雲。少時學習漢學，以英資聰慧稱。曾入海軍省，任海軍少尉。二十六歲為交換日清修好條規的批准書，曾根作「判任隨員」隨大使赴清。1878年以「清國通」謁見明治天皇，獻上《清國近世亂志》（1879年刊行，主要記太平天國亂事）和清國《諸炮台圖》兩部書。後升任海軍大尉。1880年創立「興亞會」，任幹事長，主張日清兩國的親睦和大亞洲主義思想。駐日公使何如璋也曾加入此會，並引介王韜入會。1904年，著《俄國暴狀志》，主張日、清、韓三國聯合抗俄，依然宣揚他的興亞思想，六十三歲病卒於東京。參見曾根俊虎著，范建明譯：《北中國記行·清國漫遊志》（北京：中華書局，2007），〈譯者序〉，頁1-3。

<sup>68</sup> 此書封面內頁並列三位作者，明治十九年（1886）十一月由東京的報行社印行。該書後收入沈雲龍主編「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第六十二輯」：《法越交兵記》（台北：文海出版社，1971）。此版本可見日人曾我佑準、赤松則良、川田剛、栗本鯤、王韜、洋務大臣伍廷芳、旅日書法家張滋昉、沈守琴、蔣同寅、曾任直隸知州的沈嵩齡及曾根俊虎（自序），共計十一人為該書作序，可見此書受到中日朝野知識人的注目。

《法越交兵記》中王韜序言，細數清末時期清廷外交之路的顛簸道途：

今日之弊，和議一成，即若無事，不知其間循環倚伏即出乎？是金陵議款，則有津門之役。臺灣議酬，則有琉球之役。經界不正，則有伊犁之役。西貢不問，則有北甯之役。但苟目前之安，而不顧日後之害，此覬覦之所以易生，肆侮之所以迭乘也。而今而後，其尚思變計乎哉？<sup>69</sup>

自1856年肇始而導致的英法聯軍、1874年日本因牡丹社事件侵占琉球、1881年與俄國簽訂《伊犁條約》收回新疆伊犁、1884年因安南（今越南）問題引發的中法衝突等等，這一連串涉外事務的挫敗，說明了中法戰爭的發生乃是內政外交問題日積月累的必然結果。文中憂心指陳清廷此役與法國的議和，極可能種下日後的變亂根苗，在在顯示出主權不振，國體、邊疆與外藩面臨危機，中國作為宗主國必須認識到東亞地區的臣屬國與朝貢體系日漸崩解的現實。

他將此序收錄在自己編選的《弢園文錄外編》卷十一中，並曾屢屢在書信中向洋務官員伍廷芳、盛宣懷提及曾根俊虎的興亞會主張，<sup>70</sup>即便後來王韜對「興亞會」暗藏侵華的野心有所批判，《法越交兵記》卻已烙下1880年代中葉「海上知識社群」思想交匯的印痕。

曾根俊虎漢文素養深厚，曾任日本海軍軍官，因蒐集與偵查情報資訊多次遊歷中國，著《北中國紀行》與《清國漫遊錄》記下他對1870-80年代中國的觀察，創立「興亞會」主張日清兩國的親睦及大亞洲主義思想。1883-1884年旅滬期間，與王韜往來密切，「昕夕過從」，<sup>71</sup>王鼓勵他著書，故有「嘯雲遂日操鉛槧，紀事陳詞，每終一篇，輒出就正」<sup>72</sup>的合作方式。故讀者不難在《法越交兵記》每卷的卷終或篇末處見到「逸史氏王韜」的長篇論評。

與1889年出版的《重訂法國志略》略一對照，就會發現，《法越交兵記》卷一末段第一處「逸史氏」評語，<sup>73</sup>後來就被王韜全數挪用到《重訂法國志略》卷十四的〈奪地安南〉一篇中；王韜在《法越交兵記》序言中所謂清廷藩屬國與邊疆地域——包括高麗、越南、琉球及台灣、雲南等地——遭致歐洲列強覬覦而牽動的問題，在《法越交兵記》卷一中有詳細剖析。

<sup>69</sup> 王韜：〈法越交兵紀序〉，《法越交兵紀》，頁29-30。亦見《弢園文錄外編》（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2），頁257-260。

<sup>70</sup> 參見王韜所著〈與日本岡鹿門〉、〈與伍秩庸觀察〉、〈與盛杏蓀觀察〉三文，均見《弢園文新編》（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出版，1998），頁300-301；頁316-317；頁318-320。

<sup>71</sup> 王韜〈法越交兵紀序〉。見《法越交兵紀》，頁22。

<sup>72</sup> 同前注，頁22-23。

<sup>73</sup> 同前注，頁143。

從東亞諸國知識精英的互動關係來看，越南使臣阮述<sup>74</sup>擔任《法越交兵記》之「校閱」者，亦釋出值得深入追索的重要訊息。阮述漢學素養深厚，作為越南嗣德朝晚期名宦，因法越交戰而分別於1880與1882年出使中國求援，無奈最終得不到中國的奧援，於1883年黯然返國。他的《往津日記》便以日記體載錄了這兩次出使中國途中所見所聞：1883年途經香江時，曾與學貫中西的王韜相見暢談，<sup>75</sup>後在上海時又恰遇短暫回滬就醫的王韜，經王引介，結識了日東文士曾根俊虎等人，曾根氏以書稿《法越交兵記》相示。阮於日記中載：

初六日，曾根嘯雲來見。余與望山延坐，筆談甚久。嘯雲乃出書二本相示。……其一為《法越交兵紀略》，所記多采諸日報傳聞之詞，訛謬太半。該員固請潤正，余摘其甚者數十條，略為刪改，餘不勝也。……初七日，嘯雲復來，言承斧正其書，不勝喜慰。<sup>76</sup>

這些段落都說明了成書後的《法越交兵記》(1886)標明阮氏校閱的緣由。

作為越南大臣，阮述不滿該書僅摘錄報刊上未盡真實的傳聞報導，便進行更正修改，並以注解式的補充，反駁或修正了曾根俊虎帶有偏狹觀點的種族歧視論述。如卷一提到：「男女顏色陋惡，步趨疎野，又自頭顱至腰腳，大有屈曲，其骨格亦多欹斜，蓋幼時母若保，使小兒兩腳跨於己之兩腳上而乳養之，故致此耳」。阮述於文後注解：「田夫野婦，貌多不揚，若官紳女士，儀容亦多俊雅，非人盡惡陋也」；<sup>77</sup>又如同一卷中，曾根俊虎提到越南土俗極重視喪禮，無論貧富，往往花費鉅金操辦喪葬之事，故「因葬親而失其家產，或陷於大不幸者有之，亦土人之風氣也」，阮駁

<sup>74</sup> 阮述(Nguyễn Thuật)，號荷亭，越南廣南省醴陽縣人，生卒年不詳，有詩集《每懷吟草》。為阮朝末年重要官員，曾先後兩次出使清朝，第一次為光緒六年(1880)，由陸路經廣西、湖南至北京，於光緒七年(1881)返國；第二次乃光緒八年(1882)臘月中旬，由水路出發，途經香港、廣州，復往上海、天津等地，於光緒九年(1883)底返回越南順化。其第二次出使行程時撰有行使日程《往津日記》一冊。因出使時日長達一年，而又途經多地，交遊唱和廣泛，故其日記「諛聞佚事，尤能引人興趣，皆由目擊，洵為實錄」。阮述身處中、越動亂之時，而又身居要職，以故《往津日記》尤能凸顯中、法、越三國之間的複雜關係，對於瞭解、研究十九世紀後期中越外交關係、歷史和文化交流等，提供重要材料。參見龔敏：〈阮述《往津日記》引發的學術因緣〉，見《社會科學論壇》2011年第3期，頁43-44。

<sup>75</sup> 阮述記載：「三十日，偕謝欽派、阮孟仙往訪王紫銓諱韜。紫詮江蘇長州人，博學能文。年前粵匪之亂，上書當事，陳破賊計；又團鄉勇以應官軍。適為讒人誣以通匪，紫詮乃避之外洋，遍遊歐洲各國。其於語言文字、人情風物，多習而知之，又能揣摩中外大局，發為議論，以寄懷抱。今在香港主循環日報館。聞余至，喜甚。邀坐筆談……問及我國與法人交涉現情，纔片刻間，彼此談紙已盈寸矣」。見阮述著，陳荊和編註：《阮述〈往津日記〉》(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1980)，頁23。

<sup>76</sup> 《阮述〈往津日記〉》，頁59。

<sup>77</sup> 《法越交兵記》卷之一，頁91。

之：「國人冠婚喪祭，皆用朱文公家禮，而喪祭二事，極其哀敬，故中國有生蘇杭、死安南之語，其喪事而用巫用僧，不過一、二家而已，非一國皆然也」。<sup>78</sup>

再看該書凡例云：

是書所載，大半係得諸各新報所登，並越南、滇粵、香港等各處電傳，以及予友池田氏歷述，在越南法陣中目覩交兵實況。其中奏章各件，或見之於京報，或譯之於西文，間有內外諸人之論說，足資採擇者，亦並錄之，使閱者知此中亦大有人焉。<sup>79</sup>

由分析可知，《法越交兵記》敘述體例固與王韜於1873年輯撰的《普法戰紀》相仿，均透過當代報刊、西文書籍蒐羅與論述詳實的戰況，掌握國際動態，但此書之編纂輯撰，更須有賴中、日、越三方有識之士的合作，方能竣工。

值得一提的是，中法戰事方殷之際，日本文士岡千仞也在1884年五月抵達上海，並以滬地為中心，至蘇杭、燕京、廣東、香港、澳門等地，展開了將近一年的中國之旅。前文已述王韜訪日期間，岡千仞與之來往密切，此番岡千仞既至滬上，除了與在滬日本友朋相見，自然也與王韜及其友朋與上海報刊界人士有了進一步交往酬酢的機會，<sup>80</sup>他亦在〈航滬日記〉、〈滬上日記〉與〈滬上再記〉（均收入《觀光紀遊》一書）中多處提及與根俊虎共同關注討論於時方殷的中法戰事，<sup>81</sup>整部日記更屢屢長篇議論剖析中法戰事的進展變化及其如何攸關東亞與國際未來局勢。如〈滬上再記〉曾載1884年12月19日參觀「申報館」，主筆錢昕伯與何桂笙出與相迎並出示日報，他才得知自己與王韜筆談議論中法戰局的內容，已成為日報上的時事策，「此篇一朝傳播，中外無不說余名姓」，引為快事；<sup>82</sup>另《申報》光緒十年十一月念六日（1885.1.11）附張，更曾刊出他與王韜唱和往還的詩作，益使岡千仞訪華一事廣為上海智識階層所知。綜觀岡氏在中土南北遊歷的觀察，甚至預言了十年後因朝鮮問題而引發的甲午之戰，如同王韜一貫關切中法關係惡化的來龍去脈，並密切注意其發展與動向的用心，皆可見東亞知識人憂心國事世局而尋索解決之道的過程，更面臨家國民族主體的現代性轉型之艱難課題，益發揭示出輻輳於滬地的「海上知識社群」思想特徵之複雜面相。

<sup>78</sup> 《法越交兵記》卷之一，頁106。

<sup>79</sup> 〈凡例〉，《法越交兵記》，頁61。

<sup>80</sup> （光緒十年）六月六日「午牌至上海……岸田吟香出迎……訪王紫詮，曰得書以後，日夜以待。曾根俊虎、品川二氏從松村少將（惇藏）來過……」（《觀光紀遊》，頁19）。岡千仞一抵滬，幾個前來相迎的在滬日人皆為中日文化交流史上的重要人物。如岸田吟香（1883-1905）為報界及出版業人士外，同時也是經營有成的實業家。1866年來滬，曾開設樂善堂，販售藥品及書籍，還參與設立東亞同文會等組織，頻繁往來於中日兩國間。

<sup>81</sup> 見《觀光紀遊》，頁19、107、118、128。

<sup>82</sup> 同前注，頁227-228。

### (三)「法蘭西」形象的海上演變

故可知，從1870年代的《普法戰紀》到1880年代的《法越交兵記》、《漫遊隨錄》，王韜的泰西史志或遊記之出版刊載，始終與上海報刊界和新聞業密不可分，這也構成了《重訂法國志略》中突出的「當代」觀點，及編譯西文報刊「時事」入史的獨有特色。

《重訂法國志略》的序言雖已開宗明義述及此書之撰著歷時近廿年：王氏曾於1870年代初奉丁日昌之命撰寫十四卷《法國志略》，<sup>83</sup>惟此書可能並未出版，直至1880年代，遊歷東瀛歸來後將《法國志略》加以擴充，大量增補日人之西洋史著作、上海的西文報刊相關消息與傳教士編纂1870年代泰西諸國之事的《西國近事彙編》，才完成光緒己丑十五年(1889)「弢園老民校刊」的二十四卷《重訂法國志略》，<sup>84</sup>但若加入前文所述1870年代的《普法戰紀》、1880年代的《法越交兵記》與《漫遊隨錄》，梳理其中脈絡，更可見「法蘭西」圖像在海上文化圈中不斷演變的種種面貌。

如《重訂法國志略》中卷七有關普法戰役的描述如〈普法交兵〉、〈法京內亂〉與卷八〈法人追論普法戰事〉、卷九〈普法用兵傳聞〉等篇章，往往在描述普法兩國用兵經過與戰爭結果時，將全歐與世界秩序重新洗牌、國際世局隱藏的不安因素帶入，即奠定在《普法戰紀》的行文理路與敘事模式之基礎上，加入1870–1880年代法國「當代史」的詮釋並擴充至世界動態，反覆申說：卷七的〈法立通商條約〉(與英國訂約)、〈訂定比利時商約〉、〈法謀據安南全境〉、〈西澳近事〉、〈東南洋近事〉(言及北非法國殖民地)，卷八的〈法圖越南〉、〈法結緬甸〉，卷十的〈俄法交歡〉、〈備論歐東時事〉、〈法注意歐東全局〉，卷十一、十二的〈法英婚盟和戰紀〉，卷十三的〈英法助土攻俄記〉，卷十四的〈法澳戰和始末〉、〈法援墨西哥〉、〈奪地安南〉、〈日本啟釁〉、〈進攻高麗〉、〈法征阿洲〉等等篇章，幾乎將法國勢力遍及四大洲的現況盡皆蒐羅納入，復不厭其煩提供訊息來源與報導素材，呈現符合時代脈動的全景視野。

卷十七〈志車路〉、〈志郵政〉中詳述法國交通運輸與電信郵政的歷史溯源：

<sup>83</sup> 雖然學界對於王韜究竟有無出版《法國志略》仍未有定論，但依筆者於台灣、大陸地區(上海圖書館、北京國家圖書館、南京圖書館)以及日本東京大學圖書館、哈佛燕京圖書館等地訪查，均未見十四卷本《法國志略》一書，故參照目前最常見的不同版本《重訂法國志略》所收〈法國志略原序〉(完成於同治辛未春〔1871年〕)所述，十四卷本《法國志略》極可能未曾出版，但其主要內容成為二十四卷本《重訂法國志略》的最初組成。

<sup>84</sup> 筆者所見《重訂法國志略》有幾種版本：南京圖書館館藏為光緒己丑年(1889)弢園老民校刊本、1890年光緒庚寅仲春淞隱廬刊(由葉耀元、鄒弢、蔡嘉穀等人手校)；上海圖書館與中研院傅斯年圖書館及哈佛燕京圖書館館藏皆為光緒庚寅仲春淞隱廬刊，中研院近史所圖書館亦有雲間麗澤學會出版於光緒壬寅年(1902)的版本。本文撰寫時，皆參考過上述版本，書中引文，為求第一手資料的詳實度，皆引用光緒己丑年(1889)於上海出版的「弢園老民」校刊本。

歐洲諸國所以遞郵傳、載軍旅、通商賈、運貨物，取道於陸者，無不恃乎輪車，故鐵路之築尤廣，而藉以覘國勢之盛強焉。按輪車鐵路之興肇自西歷一千八百零四年，今歐洲列國共置鐵道二十七萬六千三百四十八里。……凡輪車所行之道，必設電氣通標，所以速遞消息，亦使彼往此來毋相誤值，此車路與電線所以必相輔而行，互為表裏也。其專設之電線則為軍國郵政所急，而民間亦得共之。頃刻萬里，神速莫比，雖隔環瀛，無殊對語，故敵國入境，必先毀鐵路、斷電線，以遏絕郵傳。<sup>85</sup>

王韜以歐游之旅「嘗至英京電報總局」<sup>86</sup>的足履目睹，以及作為第一代媒體人採用隔洋電報消息於報章新聞的經驗，提出對於泰西郵政與火輪車之便捷的親身感受，也呈現歐洲國家不管在國防軍旅或民間貿易與日常生活便利各個層面皆獲裨益。令人想起王氏《普法戰紀》中描述普軍於開仗的第一個月首次獲捷後，即著手「建築鐵路，轉輸軍實，以資接濟」，「所造鐵路，仿亞墨利加人建於平原之法，殊甚簡潔，不日可就。建築工匠，日有數千人」，「鐵路既成，皆以輪車轉饟，供應軍需。糗糒芻糧，器械彈藥，無不充給」<sup>87</sup>的種種描述。火輪車的順利運輸，確保了前線的充足物資，鐵路又與電線網絡的設置密切相關。故可見《普法戰紀》中的犀利洞察與《重訂法國志略》一以貫之，後者更從主述中心法國為輻輳，投射出充滿危機卻飽含可能性的世界新秩序，給予晚清中國與東亞知識圈一道在時代危機中思索新契機的視角。

熟悉《點石齋畫報》上《漫遊隨錄》的讀者們，不難在《重訂法國志略》卷廿一〈法京巴黎斯志〉重遇法京繁華，邂逅似曾相識的巴黎風光。該卷以全數篇幅描繪巴黎城市圖景，其中〈博物院〉、〈藏書庫〉、〈戲館樂園〉、〈火車輪路〉、〈法王遺跡〉、〈街衢市肆〉、〈馬車公所〉、〈新聞紙館〉的描述文字，皆剪裁自《漫遊隨錄》中對巴黎風俗社會的描繪。<sup>88</sup>如卷十七〈志學校〉詳述泰西教育制度，受教之權男女平等：「教化又下及乎女子，國中女塾公私並設，不櫛之流，咸工筆墨而嫺吟詠。琴歌畫理，數學方言，無不兼通並擅，或有鬚眉而媿此巾幗者」，<sup>89</sup>即讓人想起《漫遊隨錄》中描述英

<sup>85</sup> 〈志車路附電線〉，《重訂法國志略》，卷十七，頁28b-31a。

<sup>86</sup> 同前注，頁32b；王韜更以1867-1870年間遊經倫敦所見，娓娓道來：「余嘗至英京電報總局，樓局崇隆，垣墉高峻，左右兩所屋，各數百椽，大堂中字盤數十，電線千條。司收發者皆少女，計一千二百人。司郵事者為男子，計九百餘人，幾至日不暇給。法便於民，利歸於官，誠為法良意美也哉！」見《重訂法國志略》，卷十七，頁32b-33a。

<sup>87</sup> 《普法戰紀》（大阪：脩道館印行，明治廿年[1887]九月），卷三，頁10b。

<sup>88</sup> 見《漫遊隨錄》中〈道經法境〉、〈巴黎覽勝〉、〈法京古迹〉、〈法京觀劇〉、〈博物大觀〉、〈游觀新院〉、〈秋千盛會〉等篇章。

<sup>89</sup> 《重訂法國志略》，卷十七，頁10a。

法諸國由女性教師開辦的女塾即便在鄉間也相當普遍，<sup>90</sup>宴席中女教師與女弟子往來論辯研習學問的情況屢見不鮮，<sup>91</sup>社交場合中常有女性彈琴高歌、跳舞、觀劇的現象，無不展現西方現代女子活躍的行動力。這些篇章中呈現的社會風貌若與晚清上海的文化條件作一番比較——1891年，曾任《上海新報》主編、創辦《教會新報》的林樂知在上海創辦了中西女塾，課程內容中西兼備，但它究竟仍是傳教士所創辦的學堂；一直到1898年，第一所由華人（經元善）自辦的中國女學才正式在上海成立，學堂內開設的功課中西合璧，<sup>92</sup>頗能彰顯歐洲女學的核心精神——便能明白：王韜分別在1887與1889年刊行與出版的《漫遊隨錄》與《重訂法國志略》書中共同呈現的歐洲城市之具體風俗樣貌，一來不乏提供讀者「域外獵奇」的閱讀樂趣，二來更提前示範了泰西文化的實踐行為，扮演了文化斡旋與協商中介的重要角色。

此外，《重訂法國志略》中有不少篇幅關注博物院與賽珍會（即世界博覽會）的建造與舉辦，卷十〈法開賽珍大會〉詳盡描述1878年5月1日在法國巴黎舉辦的世界賽珍大會從籌備、佈置到建造雄偉建築以供展覽的過程。宇內珍奇寶物羅列目前自不待言，該卷中〈記賽真會參觀人數〉、〈賽珍會獎賞〉更鉅細靡遺載出世界各國前來參展觀覽的人數與列國獲獎情形。由於王韜早年（1867）旅經巴黎曾親眼目睹世界博覽會「傾動各國」的空前盛況，<sup>93</sup>因此他對賽珍大會中東方國家中國與日本參展之情形尤為關注，特別詳盡描繪日本所展覽物品，耐人尋思。如他提到：

內有最動人者，為文學一類，有格致器具物質，由是以觀日本幼孩自少學習西法，出自平日父母之教訓。所謂少成若天性，習慣如自然，已與泰西不甚相懸，其教習之法，倣照英國北省章程，最為講究。男女皆分塾督教，房屋均高大通風，並令學徒諳曉保養身體臟腑方法，雖倫敦巴黎，無以加此。<sup>94</sup>

接著評論明治新政的教育改革推行方針：

古時學塾墨守舊法，但讀中國書，全不明格致要理，飽饗糟粕，以誤終身。今皆讀外國有用之書，測繪地圖，認真不苟，論歐羅巴各國疆域，甚詳且盡。所列水師表，凡各口岸險要處所，有圖有說，朗若列眉，並指明燈塔隘口，俾航海者避危而就安；所繪國家全圖、東京輿地，精妙絕倫，一無錯誤，可稱能自成家。不謂通商泰西歷年無多而已能如此，國政人心效應如

<sup>90</sup> 見〈杜拉游山〉、〈三游蘇京〉。《漫遊隨錄圖記》，頁113、134。

<sup>91</sup> 王韜〈三遊蘇京〉，見《漫遊隨錄圖記》，頁143。

<sup>92</sup> 課程有英語、算術、地理、圖畫、醫學、中文（內容包括：《女孝經》、《女四書》、《幼學須知句解》、《內則衍義》、唐詩、古文）、女紅、體操、琴學等，可謂中西合璧。參見夏曉虹：《晚清文人婦女觀》（北京：作家出版社，1995），頁20-26。

<sup>93</sup> 《重訂法國志略》，卷十〈法開賽珍大會〉。

<sup>94</sup> 同前注，頁37a。

響，豈偶然哉？論者謂日本於前時本與歐洲相反，蔽明塞聰，以拒絕外國，有賢哲者出，高蹠遠矚，亟與歐人相交。屏除從前陋習，擴拓此後新規。其最足令人欽佩者，用歐人之長而不學歐人之短，從善如流，伉爽謙藹。於賽會之事，竭力周旋，所定價值，一秉至公，一旦風氣變通，日見旺盛，為效之速，一至於斯也！<sup>95</sup>

相較於這段文字後，緊接著對中國展覽品有古銅瓷器、裝儲之物、三寸金蓮、木器、衣服、來自台灣的番族軍械、從廣東福建寧波上海天津各通商口岸運至的物產與食品……等等，僅以羅列山珍海錯、各方奇異物事為主，談不上從系列展品中凸顯精神理念，上面這段有關日本教育從根本處實行理念的敘述，益發令人對學習泰西之法並去蕪存菁的明治維政府之嶄新氣象印象深刻。由測繪各國地圖與口岸形勢的精準之描述，也嗅得出幕府垮台後的新政府積極經營涉外事務與勘查世界輿地形勢的旺盛企圖心。

這段話中也看出王韜對於明治初年認為「中國書」跟不上時代潮流，該將之揚棄，頗有同感，其模仿自英國教育體制，但卻能「用歐人之長而不學歐人之短」，屏除陋習，融合東西教育理念之精髓，此由上而下浸染薰陶的時代風氣，也造就了開闊之視界與健朗之國家精神，具體展現在日本參加博覽會與西人周旋時不卑不亢的作風。王韜在字裡行間透露的政治改革理念不言可喻，衡諸中國情景，該書所談論泰西與日本施行社會文化新法的策略方針之足堪清廷主政者借鑑，亦可視為為王氏輯撰法國史志要旨之所趨。

以上種種，都說明了王韜筆下「法蘭西」形象的豐饒意蘊。《重訂法國志略》兼有《普法戰紀》、《法越交兵記》自歐陸戰爭與帝國侵略的野心著眼，予以系統性剝切分析之犀利視野，復以《漫遊隨錄》看似片斷瑣碎與非抽象哲思的筆觸，娓娓道出泰西現代化的運輸與郵電系統、教育體制，乃至於報館、印書局如何啟迪民智與開拓視野，善加運用物文明條件創造便利的日常生活，實為上海讀者最易接受的文化信息。其所釋放的新文明氣氛和含藏在內的隱憂，辯證地為十九世紀末葉的上海學著作或泰西地理書，開拓多方觀照及反思內視的獨特視野。

### 三、眾流歸海——海上知識社群的深層對話及辯難

#### (一) 文明盛景抑或暴力輪迴？

前兩節詳述 1849–1889 年間王韜與上海、香港報刊界與東亞知識圈的對話關係，可描繪出一個更為清晰完整的輪廓：固如王韜在凡例所言，《重訂法國志略》乃「取資於日本岡千仞之《法蘭西志》，岡本監輔之《萬國史記》，而益以《西國近事彙

<sup>95</sup> 同前注，頁 37a–b。

編》，不足則復取近時之日報，并采泰西撰述有關於法事者」編纂成書，但若仔細比對高橋二郎從法國猶里氏 (Jean Victor Duruy, 1811–1894) 之原著抄譯、岡千仞刪定之《法蘭西志》，岡本監輔《萬國史記》「歐羅巴史」中的三卷法蘭西記，卻可進一步得知，王韜 1879 年的扶桑之行除了即時汲取明治初期日本先進知識份子的法國史料資源成為《重訂法國志略》前六卷的主要構成外，他自身長達廿餘年對法國史事的關注與搜羅，時時將英國及世界局勢參照比較的動態視野，以及與日人二著的交鋒辯難，已使得《重訂法國志略》跳脫固有格局，鑄鑄為王氏法國論述之集大成著作。

且看《重訂法國志略》前六卷，記述美魯萬的氏建國至保拿巴氏 (即拿破崙) 為止，直接援用的是正值弱冠之年<sup>96</sup>的高橋二郎所譯《法蘭西志》。<sup>97</sup>王以高橋本過簡，故採岡本監輔《萬國史記》卷九至十一的《法蘭西記》三卷內容增補之，構成數千年歷史沿革與治亂興衰的法國編年史。該書的序言與例言中，也可見到王韜引述兩部日本著作中的序跋或凡例，為自己撰著法國史的緣起，以及相異於兩書的觀點作出解釋，甚或反駁修正。如《重訂法國志略》的第二篇序文開宗明義提出：法國乃是歐土中心的強國，在列國中率先與中國通商往來，但近數十年來，「政令傾頽，紀綱壞亂」，國家屢經蕩亂，政黨傾軋，人民不安，「法國人才前後輩出，皆能垂法於歐土，而國人常不得蒙其福，論者惜焉」。<sup>98</sup>序文開篇實乃錄自岡本監輔《萬國史記》第十一卷〈法蘭西記〉 (即為法國史三卷的最終卷) 的末段述評，<sup>99</sup>下文接著探討問題癥結並尋求治國良策：

日本岡本監輔讀法史至此，喟然嘆曰：嗚呼！法國之人，乃歐羅巴難治之民也。蓋自高盧桀驁自恣，以抗強敵羅馬而卒收厥効，哥羅味豪邁性成，大

<sup>96</sup> 《法蘭西志·附言》第七條：「第余弱冠敢撰此書，豈敢謂有所自發明焉？」可見高橋氏撰成此書時年約 20。見猶里氏原撰，高橋二郎譯述，岡千仞刪訂：《法蘭西志》(日本露月樓上梓，明治十一年 [1878] 五月刻成)。

<sup>97</sup> 易惠莉指出，近代中日文化交流對中國有轉折性的變化當在 1872 年。這一年，日本明治政府對漢學教育措施改變，允許日本書籍出外販售，中國士人得以閱讀，形成文化交流目的 (〈日本漢學家岡千仞與王韜〉，頁 3)。筆者以為，從海上知識社群的形成演變過程來看，更值得注意的是這一年《申報》創辦，且迅速成為上海第一大中文日報，故高橋與岡千仞本《法蘭西志》與岡本監輔之《萬國史記》皆曾於中國出版，前者有「湖南新學書局本，去眉批及東文」版本，後者有「申報館本，上海排印本，十冊」。可知當時對西學與新學關注的文人，皆知曉王韜《法國志略》多取材於高橋本《法蘭西志》。見徐維則：《增版東西學書錄》(光緒二十八年出版，1902 年)、趙維熙：《西學書目問答》(光緒二十七年出版，1901 年)，二書均收入熊月之主編《晚清新學書目提要》(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7)，頁 11、18、571。

<sup>98</sup> 《重訂法國志略》，〈序〉二，頁 2a。

<sup>99</sup> 見岡本監輔編纂，中村正直閱：《萬國史記》(東京：岡本監輔出版，內外兵事新聞局出發兌，明治十一年 [1878])，卷十一，頁 29a–30a。

廓疆宇，沙立曼英武蓋世，推倒全歐，而國人皆化其風，爭功好勝，視若尋常。及路易十四，據無上之尊，肆無限之權，國人憤鬱，漸至放恣，此所謂川決而隄潰，其勢使之然也。故非洩諸外，則發於內，禍亂相因，日甚一日，雖國律變更，終難以挽回，可勝慨哉！歷觀萬國，其民難治者亦多，固未有如法人者也。竊為之深思遠慮，欲弭其亂，而未有良策，無已有一於此：擇五大洲中要害數所，建立公法會，稱為天討府，鎮壓萬國，擬定條規十，令其遵行，期止兵亂，然其所言，同於向戌之弭兵，自非有大一統之主出，畏威懷德，必不能也！<sup>100</sup>

但王韜對岡本監輔所謂效仿春秋時期宋國大夫向戌對六國提出的弭兵之議，建立一超然各國之上的勢力：「公法會」，並制定十策遵行政令，賦予「天討府」鎮壓亂事與約束民人的權力，頗不以為然。故有此斷語：

岡本監輔所論十策，乃書生迂談耳，不足當歐人一笑也。<sup>101</sup>

此「十策」即岡本氏在《萬國史記》卷十一〈法蘭西記〉末段詳述推舉出天討府的「大總管」、徵求自願兵、政教分治、管制兵器以避免民亂……<sup>102</sup>等方案。可王韜將岡本原文通篇略過，僅指出此類「書生」之議在實踐層面上空礙難行，治標而不能治本；其「以暴制暴」<sup>103</sup>思維亦隱約顯露軍國主義的傾向。<sup>104</sup>

這段敘述後接著是「逸史氏王韜」的大段議論：從歐洲歷年來的國際戰爭中剖析法國未能善用各國矛盾關係創造有利條件，文化風俗則「俗士輕佻，好為小說家言，纖語淫詞，不免壞人心術」，<sup>105</sup>在歐土中「教化」當屬次等；貿易通商與拓展經營勢力的上亦不若英人之殫心竭慮，最後更指出法國「重兵不重民」是一大癥結，「蓋必先得民

<sup>100</sup> 《重訂法國志略》，〈序〉二，頁1b-2a。

<sup>101</sup> 同前注，頁2a。

<sup>102</sup> 《萬國史記》，卷十一，頁29b-30a。

<sup>103</sup> 關於王韜在《重訂法國志略》中究竟以譴責「民亂」或歌頌「革命」來記述法國的政治動亂與大革命，兩者之褒貶概念之分析，易惠莉、日本學者佐藤慎一與陳建華皆曾為文詳細探討，也顯現出王韜對弭兵治亂的概念始終游移未決，與日本開明知識圈代表人物岡千仞、岡本監輔等人傾向進化史觀的主張有所分歧。見易惠莉：〈日本漢學家岡千仞與王韜〉，頁10-13；佐藤慎一：《近代中國的知識份子與文明》（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6），頁183-186；陳建華著，張暉譯：〈世界革命語境中的中國「革命」〉，《東亞觀念史集刊》第一輯（台北：政治大學出版社，2011年12月印行），頁243-246。

<sup>104</sup> 王韜1879年赴日期間，岡本監輔曾來拜訪王韜，王韜對他的新作《萬國史記》稱賞不已，但針對學習西法一事也交換不同意見：「午後岡本監輔來，……余謂做做西法，至今可謂極盛，然究其實，尚屬皮毛，並有不必學而學之者，亦有斷不可學而學之者，又其病在行之太驟，而摹之太似也」。《扶桑遊記》，頁130-131。

<sup>105</sup> 《重訂法國志略》，序二，頁2b。

心然後能得土地，未有民心不向而能常有其土地者也。嗚呼！法於此不當憬然悟，惺然悔，而翻然亟思變計也哉？」<sup>106</sup>

以之為殷鑑，王韜不厭其煩、一再申明撰著一部詳實的漢文泰西史傳之迫切性：

日人木原元禮<sup>107</sup>曰：自龍門作史，始創傳體，成匈奴西夷諸傳，嗣後歷代正史，因之必立外國傳，以志四裔，蓋以備遠徼、籌邊防，不可不講之於平日也。惟其間敘事，率多孟浪，道聽塗說，襲謬承訛，不足為典要。豈由詳內而畧外、兼之侈乎文而儉乎實，殊方異族，不屑悉心為之考核歟？方今泰西諸國，智術日開，窮理盡性，務以富強其國，而我民人固陋自安，曾不知天壤間有瑰瑋絕特之事，則人何以自奮，國何以自立哉？余謂木原節夫斥昔日史官之陋，其說誠是也！<sup>108</sup>

與高橋本《法蘭西志》相對照，會發現王韜引述木原先禮之語，乃為木原氏為《法蘭西志》所撰跋文之首段內容，此論深得作者認同，於此可見；《重訂法國志略》「凡例」第五條提出：

歐洲各國，素無史職，記載闕如，近代始有私史，其所以搜羅佚事，網舉舊聞，大半出於教士之手，其書又不諳體例，詳畧失當。近今所譯於中土者，惟紀國俗、輿地、物產而已，事實未備，茲為之補其所缺失，而後一國之典章制度，粲然以明。<sup>109</sup>

此文實轉化自沈文燾(1832–1886)<sup>110</sup>為《法蘭西志》所作序言。<sup>111</sup>王韜赴日時沈氏任第

<sup>106</sup> 《重訂法國志略》，序二，頁3a。

<sup>107</sup> 木原元禮，又名木原雄吉，字節夫，號老谷。日本儒學家，曾任修史館協修，為岡千仞摯友，與岡千仞、重野安繹是少年時同學。死後重野安繹為他撰墓誌銘，著作有《老谷遺稿》。見蔣英豪編著，《黃遵憲師友記》（香港：香港中文大學，2002），頁133–134。

<sup>108</sup> 《重訂法國志略》，序二，頁3a–b。

<sup>109</sup> 《重訂法國志略》，凡例，頁1b。

<sup>110</sup> 沈文燾，字梅史，一作梅士，室名春萍館，浙江餘姚人。1877年任駐日公使隨員。常參加與日本文士名流的筆談，曾與黃遵憲、王韜為日本漢詩人森春濤之子森槐南的劇作《補春天傳奇》撰文「序評」、卷首題詞。見森槐南：《補春天傳奇》（東京：森泰二郎出版，明治十三年[1880]）。嘗與黃遵憲聯句作〈摸魚兒〉詞譜贈源氏後人大河內輝聲（源桂閣）。有《途中記行詩》，記隨使日本途中事，又有《石稿文集》，1880年初離日返國。見《黃遵憲師友記》，頁158。沈氏與在日之中國文人與日本漢學家的詩歌往還，詳見石川鴻齋編：《芝山一笑》，收入王寶平主編，「國家清史編輯委員會·文獻叢刊」：《晚清東遊日記匯篇（1）·中日詩文交流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頁59、66、69、72、73。

<sup>111</sup> 序言中提及「法蘭西於古為奧盧地，漢初元間始屬羅馬，至齊高帝時始立國，其後治亂廢立不常，國無史職，記載闕如。近代始有私史，搜羅軼事，撮舉大略，顧其書不諳體  
〔下轉頁44〕

一任駐日公使何如璋之隨員，沈氏在文中讚揚「岡君與高橋氏」為深識時務之俊傑，與王韜輯撰法國史以切實了解世界動態為尚的觀點不謀而合。按清廷外交官何如璋(1838–1891)擔任駐日公使的四年半期間(1877–1882)，正是幕府垮台後，明治新政甫成，新舊政權接壤過渡的時代，作為大清公使，在爭取國家權利的同時，<sup>112</sup>亦與日本朝野文士往來密切，尤其關注惟西學是尚的明治初期日本知識圈新出版的世界史書籍。《萬國史記》的卷首即有何氏「經國之大業 不朽之盛事」的書法題詞，讚譽此書網羅西學與外國史傳的宏富知識。<sup>113</sup>同樣的，沈文熒作為外交公使之隨員，為高橋二郎新著之法國史撰寫序言，證明了外交使節與當地知識圈往來密切，可見晚清涉外官員留心日人積極編譯撰述外國史著之一斑，日東文士因應變局與掌握世界局勢的強烈企圖自不待言。

## (二) 上古三代遺風 —— 議會制度與法典

饒具意義的是，不僅是王韜在1880年代末葉編撰法國史志時取資日本文士編譯的著作，高橋二郎《法蘭西志》卷二終段的論說部分(大部分出自岡千仞之手)，主要回溯並詳述法國議會體制的創始與源流，書中眉批部分也引述當代重量級讀者王韜的回應自我揄揚一番：

論曰：法國之有國會，創於法蘭哥之時。迨泰甫帝興，始開國會，為張治化之基本。令郡國舉代議士，春秋徵集，討論憲法制度，授之百司，施行政事。此會一開，為君相者不得濫用生殺與奪之權……至聖路易，主歸立法之權於國會，統行政之權於君相。公會、大議會等，陸續繼起，上下權限畫一，得人盡其分，始為軍民同治之體。各國模仿，駸駸乎日進文明之域。無

〔上接頁43〕

例，詳畧失當，又多出於教士之手，凌雜異端。譯於中土者，惟紀國俗、輿地、物產而已。書不同文，語侏離舌，人諳其語而拙於文學，士長於彼而昧其字，欲為之志，不亦難乎！」。見《法蘭西志》，沈序，頁1a–3b。

<sup>112</sup> 何如璋任職其時恰恰面臨日本強逼琉球為藩屬的一連串事件，其中以琉球漁民漂流到台灣，遭牡丹社生番殺害事件為藉口的「牡丹社事件」最具代表性，日本政府據此向清廷抗議，意欲侵台，並逐步實現將琉球吞併的野心。此事在當時廣受關注，王韜在香港期間也於《申報》上發表政論〈台灣土蕃考〉(1874年5月12日)，此後亦有〈琉球歸向日本辯〉、〈琉球入貢日本考〉、〈駁日人言取琉球有十証〉、〈流事不足辯〉、〈琉球朝貢考〉一系列文章探討此事，足見其憂心國事。參見謝旻琪：〈何如璋在日本〉，見林慶彰主編，王清信、葉純芳編輯：《近代中國知識份子在日本》(台北：萬卷樓出版社，2003)，頁2-5；游秀雲：《王韜小說三書研究》，頁280。

<sup>113</sup> 參見徐興慶：〈王韜的日本經驗及其思想變遷〉。見徐興慶、陳明姿編：《東亞文化交流：空間·疆域·遷移》(台北：台灣大學出版中心，2008)，頁164–169。

他，以議會為張治化之基本也。……英人模里蘇著《萬國綱鑑》，贊帝德為歐洲堯舜，殆非虛稱也。<sup>114</sup>

此段文字本頁上緣之眉批處有：「王韜稱米利堅志為深識遠慮，稔歐洲事情。如此論，真稔歐洲事情矣」，<sup>115</sup>可知王韜在日期間，岡氏與之頻繁往來、筆談時事與外國史。故兩人對歐美議會制度的共同看法，便呈現在刪定評論高橋氏的《法蘭西志》中，側面顯出日本知識圈剖析國際情勢與尋思建立一理想政治體制的思想腳蹤。

兩人頻繁思想交鋒，或可解釋《重訂法國志略》多處篇章專論法國議會，表現出王韜對此制度高度關切的理由。王韜不僅詳盡敘述自法國創設議院後，歷經各朝多次王權擴張、黨派傾軋、修法易則等等變革，更特意凸顯法國議會制度屢仆屢起的來龍去脈，證此良法美制之實行並非一蹴可幾。<sup>116</sup>學者指出，王韜《重訂法國志略》卷十六〈志國會〉一文，多取自張德彝《航海述奇》中參觀英國議會的段落，他還將張氏對於「巴力門」(parliament, 泛指議會或國會)的描述挪用在法國「國會」制度的介紹上，讚揚其內在精神「猶有上古之流風遺俗」。<sup>117</sup>曰：「中國三代以上其立法命意，未嘗不如是。每讀歐史至此，輒不禁望然高望於黃農虞夏之世，而竊歎其去古猶未遠也」，<sup>118</sup>與日本士人亦以中國政治清明的上古黃金年代來稱譽法國創始國會之帝王，其「帝德為歐洲堯舜始」<sup>119</sup>之用詞如出一轍。

王韜關於法國議會的介紹描述與說明此制於泰西國家行之有年，固然來自於他的歐洲經驗(特別是英國與法國)，也為晚清士人了解法國情勢提供了重要資訊，但更可關注的是，《重訂法國志略》敘述歷史治亂時，更以法國國會的興廢與變革作為指標，歷歷呈現各朝代議會制施行的顛簸道途：如卷三〈大興民會〉，卷五〈開議

<sup>114</sup> 《法蘭西志》，卷二，頁9b-10a。

<sup>115</sup> 同前注，頁10a眉批文字。該言為1879年王韜抵日後未久與岡千仞暢談之言：「鹿門(按，即岡千仞)會著米志、法志，於泰西情形，瞭然若指掌。近又譯英志，已得二卷，視慕維廉所撰。言簡而事增，誠不朽之盛事也」。見《扶桑遊記》，頁47-48。

<sup>116</sup> 王韜在日期間，《朝野新聞》主筆成島柳北與高橋基一合譯了英人趙舞尔的原著《英國國會沿革志》，並由《朝野新聞》社印行出版(明治十二年四月印行；該年五月十日、七月六日、九月十七日的《朝野新聞》第四版廣告欄皆可見此書的廣告)。成島柳北的序，亦強調英國國會制度「屢改屢變」，非一日即臻於善美之境，故需徵諸文獻，以倣其典章制度，裨益國政。見《英國國會沿革誌·序》(東京：朝野新聞社出版，1879)，頁1-2。

<sup>117</sup> 〈志國會〉，見《重訂法國志略》，卷十六，頁28a。相關論述參見潘光哲〈追尋晚清中國「民主想像」的歷史軌跡〉，收入劉青峰、岑國良編，《自由主義與中國近代傳統：「中國近現代思想的演變」研會論文集(上)》，(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2)，頁137-141。

<sup>118</sup> 〈志國會〉，見《重訂法國志略》，卷十六，頁28b。

<sup>119</sup> 同樣的，對於英國國會制度，王韜也經常以「實有三代以上之遺意」稱道之，將中國上古「三代」視為政治圖像的完美境界。見王韜：〈紀英國政治〉，見《弢園文錄外編》，頁89。

會》，卷七〈法國會黨作亂〉，卷九〈議員復集〉、〈擬設上院〉、〈更議國法〉、〈議院與黨相傾〉、〈追論議院歷年變動〉，卷十〈新建議院〉、〈新舉議員多主民政〉，卷十六〈志國會〉……等，王韜在書中花費大量篇幅詳述並格外關注當代現況的筆墨，置諸1890年代的中國，不啻為觀察歐洲國家實行民主法制亦屢改屢變的清晰脈絡，益發顯出建立一典章制度的緩慢艱辛步伐。

與高橋二郎《法蘭西志》眉批中所謂「熟稔歐洲事情」的王韜對國會、政黨等民主法制之核心關懷相仿，《法蘭西志》卷六中野口之布(1830-1898)<sup>120</sup>在眉批處讚揚拿破崙創立新法典一段文字，亦被全數引用，並改頭換面為《重訂法國志略》之卷六尾段的論說。

王韜先引錄「異史氏」(岡千仞)之言綜述拿破崙一生功過：

余特惜其徒恃攻城野戰之力，逞摧堅挫銳之威，戰鬪愈勝而國力愈疲，威武愈揚而智力愈窮也。余觀古來英雄用兵，立大功於天下者，必用諸不得已者也，何謂不得已？禹之行水是也，禹疏江淮河漢瀦彭蠡巨澤，皆因水勢之不得已者，而疏導之。<sup>121</sup>

接著指出拿破崙對普、奧、英、俄之戰，即因非「不得已」而貿然用兵，故導致最終之潰敗。王韜對此說表示贊同：

岡千仞此論，可謂能得其要領矣。日人野口之布曰：古今英雄，規模宏遠者，往往不留心於細務，獨崙帝攻畧之暇，用心吏治，定五法、創諸學，精到周詳，各國奉為模範，崙帝洵高出他英雄上哉，千百世下猶令人聞風興起焉。<sup>122</sup>

王韜借岡千仞與野口之語，強調一代霸主拿破崙大起大落之傳奇，最值得稱道之處並非其戰功彪炳，橫掃歐洲各國千軍，將法國國力推到巔峰，而在於頒布二千三百條律例的「民法」，又稱《拿破崙法典》。自此法令頒布後，「盛築博物館、藏書庫。各科學校，創褒賞式，國人勳勞，國家發明，各科藝術、器械者，賜牌章勸獎之。

<sup>120</sup> 野口之布，字士政，號犀陽，為王韜於閏3月25日抵達東京時，前來迎接並同宴於東台長醜寺之日本文士中一員。見《扶桑遊記》，頁37；另參見王立群：《中國早期口岸知識份子形成的文化特徵：王韜研究》(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9)，頁230。

<sup>121</sup> 《重訂法國志略》，卷六，頁34a。

<sup>122</sup> 同前注，頁35a。高橋本《法蘭西志》野口之布的眉批為：「古今英雄，規模大者，不留心於細事，獨拿帝攻畧之暇，用心於吏務。定五法，創統計學，精到周悉，各國奉為模範，是拿帝之規模所以異他英雄」。見《法蘭西志》卷六，頁21a-b眉批文字。

專講民利，興國益，政績粲然，闔國歡戴」，<sup>123</sup>此新法打破舊有的階級觀念，因「法國舊賜武器賞將士之功，崙此法一行，褒賞遍加，民權均一，無復貴賤懸隔之弊」。<sup>124</sup>此法遂行後，無論士庶貴賤，有創造之功者，皆能均沾榮譽。換言之，拿破崙從法律層面施以釜底抽薪的政治改革，也對法國的社會文化風俗造成深遠影響，此乃王韜所強調：崙帝創行法典之精神，足為治國者之鑑鏡，其典範將永垂後世的主要原因。

王韜與岡千仞對於君主何時應「用兵」的相異態度，在卷四末段並列「異史氏」與「逸史氏」論評間的角力見出端倪。按《重訂法國志略》中「異史氏」與「逸史氏」的對話回應與批判，歷來已受到研究者注意，<sup>125</sup>王韜在每卷之末除了抄錄高橋本《法蘭西志》中岡千仞的評論，名之曰「異史氏」外，接著還有如《史記》「太史公曰」之總結式史傳評論，即以「逸史氏王韜曰」起頭，展開對法國歷史與異史氏（岡千仞）的歸納總結及辯駁。故《重訂法國志略》前六卷卷終「異史氏」之後的「逸史氏」總結論評，不但清楚反映了十九世紀末東亞知識人思維流變與複雜內涵，更道出彼此批駁商榷的當代觀點，為中日知識界的思想交鋒留下珍貴側影。

誠然《重訂法國志略》前六卷每卷終段可以清楚見到岡千仞與王韜「並列式」的法國史評論與針對當代政治的不同主張。但若逐字對照高橋本《法蘭西志》，就會發現：王韜非但經常逸出法國史的敘述脈絡發表自己的評價，亦不甘於扮演「忠實抄錄」者，僅將日人史著評論原文照登，最後再加以總結論斷，而往往是在引錄中加諸個人的判斷並予以刪增剪輯，甚至暗渡陳倉地將之轉換成自己的觀點。

列出兩書（指《法蘭西志》與《重訂法國志略》）卷三的末段文字，我們發現，王韜除了將《法蘭西志》的「論曰」安上「異史氏曰」置於《重訂法國志略》中，還將其中牽涉到岡千仞對中國政治的批評段落移花接木，予以「加工」剪裁，這麼一來，原文之意圖因此大異其趣，轉化為王氏個人的特殊觀點。試比較兩書之文：

<sup>123</sup> 《法蘭西志》，卷六，頁9a。王韜將這段話稍加潤飾全數錄下：「專講民利、興國益，辨人民交際權利之別。有暇親臨講席，條分件析，剖論入微，老學士聞之，莫不歎服。政績粲然，闔國歡戴」。見《重訂法國志略》卷六，頁12b。

<sup>124</sup> 《法蘭西志》，卷六，頁9a-b眉批文字。王韜則以「注解」方式呈現，見《重訂法國志略》卷六，頁12b。

<sup>125</sup> 見 *Between Tradition and Modernity: Wang T'ao and Reform in Late Ch'ing China.*, pp.122-128。

出處	《法蘭西志》 <sup>126</sup>	《重訂法國志略》 <sup>127</sup>
評述	論曰	異史氏曰
出文字對照	余觀九世路易護民權，及四世非立論國人自由權利，喟然歎曰：歐洲各國所以日趨乎旺盛者，在於此也歟！……蓋歐洲各國法律與漢土同其名而異其實，漢土法律出於法官所制，故為法以張政府威權為主，政府威權日愈隆盛，而人民生氣日愈凋敝矣。歐洲法律成於國會所定，故其為法以護人民權利為主，人民權利日愈增加，而國家元氣日愈隆盛矣。近世英米雄視宇內，職是之由。嗚呼！一法律也，一為漢土，一為英米，世之論政體得失者，宜鑑于此也。	余觀路易護民權，及腓立論國人有自由權利，喟然歎曰：歐洲各國所以日趨于強盛者，其在斯歟！……蓋歐洲各國法律尚有三代之遺風，不務其名而求其實，夫治國大綱不外兩端：一尊君以臨民，一保民以輔君。君尊民卑，則必以張政府威權為主，政府威權日愈隆盛，而人民生氣日愈凋喪矣。歐洲有議院、有國會，君民共治，一秉至公，所有法律皆成於國會所定，故其為法以護人民權利為主，人民權利日愈增加，而國家元氣日愈充厚矣。上下之情通，君民之交固，國家有大事，千萬人之心為一心。近世歐洲列國雄視宇內，職是之由。嗚呼！世之論政體得失者，宜鑑于此也。

王韜將岡千仞文中提到漢土雖有法律制度，但卻集權於君，人民未蒙自由權利的段落刪去，轉將歐洲各國行之有年的議院國會制度視之為中國上古「三代遺風」的展現。可見在王韜心中，歐洲各國施政典範之核心內涵，實與中國遠古「三代」精神遙相契合呼應，「上下之情通，君民之交固，國家有大事，千萬人之心為一心」，君民同心必能達到政治清明之理想境界。此觀點在《重訂法國志略》卷十六〈志國會〉一章中再次強調，也讓我們看到王韜對「三代」理想圖像在歐洲的國會制度中復活重現，於中土卻不見薪傳，發出喟然長歎：

逸史氏王韜曰：國會之設，惟其有公而無私，故民無不服也，歐洲諸國類無不如是，即有雄才大略之主崛起於其間，亦不能少有所更易，新制變亂舊章也。偶或強行於一時，亦必反正於後日，拿破崙一朝即可援為殷鑑。夫如是，則上下相安，君臣共治，用克垂之於久遠，而不至於苛虐殃民，貪暴失眾。蓋上下兩院議員，悉由公舉，其進身之始，非出乎公正則不能得，若一旦舉事不當，大拂乎輿情，不洽於群論，則眾人得而推擇之，亦得而黜陟之，彼即欲不恤人言，亦必有所顧忌而不敢也。中國三代以上，其立法命意，未嘗不如是。每讀歐史至此，輒不禁畢然高望於黃農虞夏之世，而竊歎

<sup>126</sup> 《法蘭西志》，卷三，頁22b-23b。

<sup>127</sup> 《重訂法國志略》，卷三，頁28b-29a。

其去古猶未遠也！<sup>128</sup>

這段話意有所指地透露晚清中國已不復見「三代遺風」，他的歎惋中隱藏著對清廷政治制度的批判之聲，亦顯露王韜在撰著法國史志上寄寓的政治變革思想。

### (三) 教會弄權與宗教干政所隱伏的東亞危機

緣於對西方教會左右政權的深刻理解，王韜，《重訂法國志略》亦透過卡煩的氏王朝的興衰，進一步檢討法國歷代侯王攻伐連年，人民恃勇好戰，「頗有嬴秦氏之遺風，顧逞其方張之氣，輒能得志於一時，而終患不能持久」<sup>129</sup>的癥結。雖然開國之君哥羅味、查理曼與路易等皆賢明君主，養士愛民，「惟其信任教士，俾預政權，輕聽妄言，勞師遠伐，卒至帑藏空虛，甲兵凋敝，驅數十萬壯士殞戮於鋒刃，轉死乎溝壑，而國幾為之匱，豈非教之為害哉？」<sup>130</sup>

顯然王韜並未如岡千仞一味讚揚歐洲政體法制，他從法國的朝代變革提出反省，並指出其中隱憂：

夫泰西之異於中土者有三，曰：君民共治也，男女竝嗣也，政教不分也。今法國時而君主，時而民主，有若奕者之舉恭不定，國家之亂遂因之而開。……獨是中葉以還，教權太重，逮拿破崙第三去位而始有轉機，作俑者，非由於王妃克魯智德哉？從來有創必有因，有開必有繼，貽謀之善，尤不可不深長思也。<sup>131</sup>

他譴責克魯智德女王 (Queen Clotilda) 將教會權力推到巔峰，乃為禍亂之始作俑者。故仔細剖析前文所述王韜增刪《法蘭西志》的文字與「逸史氏」之評價，我們一方面可以見到晚清士人雖面對「世變」與東西洋文化的衝擊，但回顧自身文化傳統，仍保持從容持平地比較優劣的態度，與明治初期崇尚西學潮流下，日本文士否定漢學與舊有體制的心理傾向大異其趣；如前所述王韜於法國國會制度施行的曲折過程亦保持高度關注，對照他與西方傳教士 (尤其是英國傳教士) 相處數十年的經驗，得以比較兩造之優劣，故高度敏感於法國天主教會權利擴張的弊病。《重訂法國志略》卷十七〈志教會〉詳述「加特力」教 (即天主教) 之源流發展與「逸史氏」的總結評論，即重複申說卷九〈追論議院歷年變動〉一章中的結論：

泰西列國之在昔日誤於政教不分，而法為尤甚。當其盛時，列國君主皆需教皇為之加冕沐膏，隱持其黜陟廢立之權，故列國無不畏之，幾於惟命是聽。

<sup>128</sup> 同前注，卷十六，頁28b。

<sup>129</sup> 同前注，卷三，頁29b。

<sup>130</sup> 同前注，頁29b。

<sup>131</sup> 同前注，29b-30a。

由是教人益橫，咸謂教皇者，口操天憲，身秉國鈞，舉足為法，吐詞為經，出一言而無敢非之，行一事而無或撓之。發號施令，布於歐洲，奉為聖身，無敢加害，惟英國知其謬，首先背之。逮乎路得既興，群趨正道，新教熾而舊教微，然因是而至誅殛焚戮者，不可勝數。觀於法之助舊而除新，日殺無辜，惟恐衛道之不力，是誠何心哉？推其兩教之分，實同源而異流，而門戶水火之爭至於若是，耶穌在天之靈不當隱恫乎哉？法自敗於普，民主主政，漸悟其非，悔禍之延，幡然改轍，誠能如監必得<sup>132</sup>之言，政自政，教自教，各行其是，毋相凌雜，教人雖欲干國之紀，豈可得哉？<sup>133</sup>

法國教會勢力膨脹後往往干預國會制度，甚且超出王權，主導議院，造成法國黨派傾軋，政治不安社會動蕩因之而生。他更預見「宗教」勢力的消長對整個歐洲局勢穩定與否影響至鉅，此紛擾爭端已可從幾個國際事件窺見其亦將延燒至歐土之外的亞洲諸國。

法國從1864年開始逐步侵略安南（即越南），亦因傳教士在越宣教受阻或慘遭殺害之事所啟釁，故為王韜一貫注目的焦點，故不憚繁瑣地在《重訂法國志略》中一再申明，如卷七〈法謀據安南全境〉，卷八〈法圖越南〉，卷十四〈奪地安南〉、〈進攻高麗〉等篇章，揭露法國在越南「割其六省，立埠通商，近復恣其蠶食之謀，旁及他境」<sup>134</sup>的野心。卷十四〈進攻高麗〉一章便從英法兩國企進據朝鮮為通商版圖卻遭到抵制說起，綜述歐洲列強對外擴張版圖的成敗之因：

按泰西人士喜勤遠略地球各國中，凡舟車所可通者，足跡幾無不遍及。效其言語文字，察其風俗民情，其運慮周，其用心密。然自攘地據疆、強兵富國外，大旨不過兩端：曰通商，曰傳教。泰西諸邦英法為雄，二者之間，英法稍異。通商則英為急，傳教則法有權。人第知西國所至各處以兵力佐其行賈，而不知亦以武備興其文事，是以議者咸謂：通商則有利有害，傳教則有害而無利，齟齬嫌隙之開，悉由於此其說是也。然而聖王在上，仍其教不易其俗，一任異教之紛馳，而無戾蕩平之王道。蓋天下事無本者不立，無實者必撥，自為消長，一聽諸天，苟其機未至而悻悻焉，必欲與之爭勝，鮮不中其毒、受其禍矣！<sup>135</sup>

法國傳教受阻往往為侵略戰爭的合法藉口，再度回應上文所述：脈絡化地觀察中法兩國關係，1858年法國教士馬賴神父被廣西西林知縣處死，此「西林教案」使法國決

<sup>132</sup> 按，監必得為1870年代法國國會議員，曾任民主黨黨魁，致書議院救國之策三方案，最後一方案即為「治教之章」，主張裁抑教人。見《重訂法國志略》，卷九，頁28b。

<sup>133</sup> 《重訂法國志略》，卷九，頁29a-b。

<sup>134</sup> 同前注，卷七，頁20b。

<sup>135</sup> 同前注，卷十四，頁17b-18a。

定攻打中國，是為英法聯軍之役之肇因；1871年法國在華天主教堂爆發的「天津教案」震動朝野中外；1884年的中法之戰亦可追溯至咸豐八年（1858）時在越南傳教的法國神甫遭當地人戕殺事件。這些都是教會勢力恃武力為後盾向中國與亞洲擴張的表徵，此脈絡之梳理讓我們明瞭王韜在《重訂法國志略》中為何針對越南問題反覆申說。他提醒：相對於清廷的漠視對越政策，日人卻始終關注越南問題。在卷十四〈奪地安南〉篇末指出曾根俊虎《法越交兵記》，已剴切剖析中法之戰後中法簽訂條約，越南全境正式成為法國殖民地的遠因近因，更為清廷怠忽涉外事務與故步自封的政策方針提出警語。不管是琉球、台灣、越南、朝鮮，這些清廷的藩屬或朝貢國，一一受到歐洲列強甚至日本的併吞與蠶食，中國作為宗主國的地位業已左支右絀，清晰勾勒晚清中國「朝貢體系」與貿易體系崩解所隱藏的深沉危機。<sup>136</sup>

故王韜的法國史志固為亞洲與中國面臨的國際形勢之深度剖析，亦不啻為晚清帝國將遭遇的重重危機，敲下警鐘；從微觀到宏觀，這部外國史除了即時掌握世界各國動態發展外，也深切認知到：中國早已不能自外於此危機四伏的世界秩序，在時代巨輪中必須積極採取因應措施，否則終將慘遭淘汰。

《重訂法國志略》詳盡分析泰西「政教不分」的歷史傳統及其後續損益影響之來龍去脈、國會與議院的創建、施行民主憲政體制過程的曲折過程，考察歐洲列強逐步進逼亞洲局勢的動態訊息，皆使得該書在上海的鉛印出版，置諸於1890年代的晚清中國，其意義已非侷限於該書凡例所言「近時英人慕維廉譯英吉里志，美人裨治文譯聯邦志畧，即以其國人之人，譯其國史，談遠畧者皆以先覩為快，而法志仍復闕如」，<sup>137</sup>欲彌補中國尚無法國史著的缺憾；亦不僅如柯文所言，王韜的著作在當時擔任中西「兩種文明間的調停者」<sup>138</sup>之不可或缺的地位，更揭示晚清時期東亞傳統文士過渡為現代知識人的主體與自我建構之艱辛歷程，呈顯出「海上知識社群」努力融攝東西方視域，思想交鋒辯證以及尋索解決時代難題的曲折步履。

#### 四、結語

本文結合王韜生命史，爬梳其1840年代末葉進入上海「麥家圈」文化社群，與歐西傳教士的交往奠定嶄新世界觀，1860年代遁至香港，得益於特殊歷史機緣而遊歷歐西諸國，1870年代末葉至東瀛與日本智識群體交流對話，此期間累積的廣闊東西文化比較視域，在1880年代中葉重返滬上後的種種文化活動與實踐，更見深邃豐

<sup>136</sup> 參見濱下武治著，朱蔭貴、歐陽菲譯，虞和平校：《近代中國的國際契機：朝貢體系與近代亞洲經濟圈》（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9），頁33-51。

<sup>137</sup> 《重訂法國志略》，〈凡例〉第九條。

<sup>138</sup> 柯文：《在傳統與現代性之間：王韜研究》中文版序言。見柯文著，雷頤、羅檢秋譯：《在傳統與現代性之間：王韜研究》（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3），頁1。

厚，故於1889付印、1890年刊行並廣為流傳的《重訂法國志略》，可謂萬斛心血所灌注而成。

從晚清西學書籍的接受流通觀點來看，1890年代以降，上海出版界出現不少纂輯各種外國史著作入套書或叢刊，並冠以「萬國」或「五洲」的書籍，王韜的《重訂法國志略》的內文或段落便常常被其他人摘錄或編輯入書。如曾出使歐、亞、非三洲的外交參贊錢恂在他1900年出版的《五洲各國政治考》中，敘述法國巴黎的都城〈街道〉，<sup>139</sup>以及鼓勵工藝創造、重視智慧財產權的民情風俗時（〈工藝〉），<sup>140</sup>就分別整段引用《重訂法國志略》內容。<sup>141</sup>與錢恂博采旁通著《五洲各國政治考》將十餘年前王韜的著作輯入異曲同工，雲間<sup>142</sup>麗澤學會於光緒壬寅年（1902）出版了由閔萃祥編輯、席裕琨校，共計二十二冊的《五洲列國志彙》叢書，王韜的《重訂法國志略》也佔有重要份量（收入該叢書第十三冊至十七冊）。可知王韜的法國史志已成為近代中國知識份子為瞭解西方而編纂百科全書時頻頻徵引的豐富資源，堪稱為晚清民初中國知識分子傳遞與累積西學，推動社會啟蒙與政經文化革新的濫觴之作。<sup>143</sup>

故王韜其人其作，恰可證海上一地的文人與知識社群的活動並不囿於上海地域，他們因國際的文士交往而愈益彰顯，反證「海上」概念的非地域性。乃知，其時於海上，或擴展為東亞世界，來自歐美的傳教士及各國文士往來交遊，或翻譯外國史志，或彼此交換新作閱看，或輯其文章段落入書，或編為報刊之內容，或出於對政局與國際時事之深切關注，合作著述，正揭示出一個不容忽視的現象：所謂「海上知識社群」，乃包含往來上海的歐美與東亞諸國菁英文士。王韜的法國史志與書寫，具體演繹多維度多面相的複雜詮釋，深刻呈現十九世紀末同期的東亞諸國知識份子遭逢世變的心態衍異過程，「海上知識社群」之思想特質與文化實踐為晚清中國現代性轉型課題注入深層辯證元素，由是臻於明晰。

【本文係國科會專題研究計劃「主體之轉異：從清末民初上海文化圈再探東亞現代性（優秀年輕學者研究計劃）」（計劃編號NSC100-2628-H-008-005-MY2）；「才子、筆政、通人：論晚清民初『海上』知識社群的思想特徵與文化實踐」（計劃編號NSC102-2410-H-008-072-MY2）之部分研究成果。】

<sup>139</sup> 《五洲各國政治考》第八卷，工政〈街道〉。見錢恂：《五洲各國政治考》（光緒二十七年[1901]上海刊本），頁10b。該書的全文掃描檔收入海德堡大學漢學系的「Encyclopedias類書」資料庫，感謝海德堡大學Rudolf G. Wagner教授慷慨提供此蒐羅廣博的珍貴資料庫。

<sup>140</sup> 《五洲各國政治考》第八卷，工政〈工藝〉，頁11a。

<sup>141</sup> 為《重訂法國志略》二十一卷〈街衢市肆〉與十八卷〈給予文憑〉內容。

<sup>142</sup> 松江古稱雲間，上海縣城隸屬松江府，因此雲間亦可視為廣義的上海地區。

<sup>143</sup> 參見李孝悌：〈建立新事業：晚清的百科全書家〉一文，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八十一本，第三份（2010年9月出版）。

# 海上法蘭西 ——從王韜的法國史志談晚清「海上知識社群」的 思想特徵與文化實踐

呂文翠<sup>\*</sup>

本文以十九世紀末葉上海文人王韜(1828–1897)所撰法國史志相關著作為中心，探討其生產、流通與接受歷程，並將其人其作品置諸跨文化交流與對話的廣闊視域中重新檢視，彰顯其作為不同國家、疆域、語言與文化之間的「媒介人物」之重要特質；進一步呈現王韜的史學著作中強烈的「當代」意識，既為十九世紀末的東亞現代性課題注入豐富的辯證元素，亦開創了現代史學的新型書寫模式；其擅於以一國為中心，呈現國際間複雜角力與世界動態的筆法，充分展現了富有變局觀的晚清「海上知識社群」之多維視野，裨吾人省思傳統文士過渡為現代知識人的主體建構歷程。

關鍵詞：晚清 王韜 法國史志 海上知識社群

---

<sup>\*</sup> 呂文翠，國立中央大學中國文學系，副教授

# Maritime France: A Discussion of the Late Qing Maritime Intellectual Circle's Characteristics of Thought and Cultural Achievements Starting from Wang Tao's Writings on French History

Lu Wen-tsuei \*

This paper focuses on works related to the collected writings on French history by Wang Tao (1828–1897), a native of Shanghai, at the end of the nineteenth century. It discusses the history of his production, propagation and reception, and places considerations of his life and works in a broad framework of transcultural exchanges and dialogue, to reconsider and emphasize how he took on the important attribute intermediary figure for different countries, regions, languages and cultures. Next, the intense contemporaneity of Wang Tao's awareness is shown in his historical works, in terms of how he interjected an abundance of dialectical elements into late nineteenth century in East Asian modernity, and how he created a new type of writing format for modern historiography. His excellent mastery of style of writing that took one country as central focus, then showed the complex international struggles and world dynamics, totally reveals the multifactorial view of a rich, changing world scene held by the late Qing, "maritime intellectual circle," that provides a chance to reflect on the difficult transition to modernity, in the subjectivity and construction of the self, made by gentlemen of traditional culture on their way to becoming modern intellectuals.

**Keywords:** Late Qing Wang Tao French history maritime intellectuals

---

\* Lu Wen-tsuei, Assistant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National Central University